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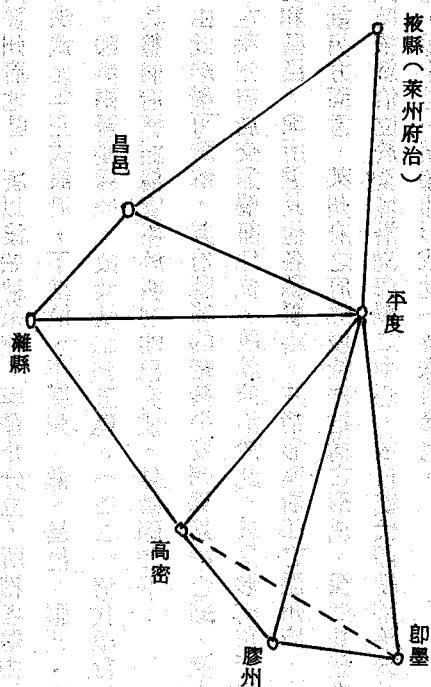
李國祜

萊州府係一古行政區，初稱東萊郡，西漢高祖時置，轄縣十七，即：掖、唾（今登州府福山縣）、平度、黃（今登州府黃縣）、臨朐（今掖縣境）、曲成（今掖縣境）、牟平（今登州府福山縣境）、東牟（今登州府寧海州境）、弦（今登州府黃縣境）、育黎（今登州府福山縣境）、昌陽（今登州府萊陽縣境）、不夜（今登州府榮成縣境）、當利（今萊州府掖縣境）、盧鄉（今萊州府平度州境）、陽樂（今萊州府掖縣境）、陽石（今萊州府掖縣境）、徐鄉（今登州府黃縣境）。（註一）約包括清代萊州府及登州府地區。唐以後始稱萊州，與登州分立，所轄各縣由於合併及分屬登州關係，僅存掖、昌陽、膠水、即墨四縣。（註二）明洪武元年正式設府，下轄掖、平度州、濰、昌邑、膠州、高密、即墨。因當時行府州縣三級制，其中濰縣及昌邑屬平度州，高密、即墨兩縣屬膠州，故共轄二州五縣。（註三）清代改行府縣二級制，遂轄有二散州五縣，因散州地位與縣相等，故實轄七縣。其整個府縣結構實係於明初即已完成。結構圖如下：

由此結構可瞭解，其府縣間的結構平度州為其中心點，但由於掖縣位於渤海灣，而渤海又為我國歷代國都北京的外海，遂使掖縣在萊州府居交通樞紐地位，故設府治於此。於是形成在府縣城結構上，以掖縣與平度、昌邑所構成之三角形為基礎，進而經平度和昌邑，與所屬其他各縣聯絡。其情形與浙江之溫州府，金華府完全不同。

就另一方面言，萊州府之府縣特殊結構之形成，深受其歷史因素影響。蓋於唐代登州未分之前，登州府所屬各縣皆轄於萊州，此時掖縣恰位於全境沿渤海灣之中心，故自漢代即設郡治於此。登州之分立，遂使其原已形成之完整結構有所破壞，乃致殘缺不全，並非是一開始即形成此一特殊結構也。

另就山東省全境而言，一般情形，如濟南、泰安、曹州諸府，其府城位置仍多是居全府之中心位置，與浙江省金華溫州諸府



一、掖縣、平度及昌邑的市鎮結構

掖縣雖自西漢以來即為萊州的郡治所在，但其今有之縣城卻築成甚晚，明洪武四年始修築磚城，萬曆廿六年以後，復因防禦倭寇，予以大修。（註五）故其縣城的確立，應在十六世紀後期。全境因依山東半島山地並當膠萊河入海處，故東南多山地，西及北方則屬平原。其圖形呈一上狹下濶之梯形形狀，縣城恰居此梯形之中心，故就地理情勢言，縣城已據有為全縣中央市鎮之優越地位。全縣面積根據民國九年所修之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計九千四百方里（約二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註六）其自明代以來人口數、密度及增長率如下表：

情況相同。祇是其此種府縣城結構之形成遠早於浙省金華、溫州諸府而已。故經此比較，我們可以斷言，明清兩代府治之選設，除政治、經濟、軍事諸因素外，亦曾考慮及其在全府之地理中心位置。其正常之府縣城間結構，仍是以府城為中心所構成之多角形。如浙省溫州府、金華府之結構，（註四）應屬於標準形態。至於此種結構之形成，則因我國文化發展是由北而南，故北方實早於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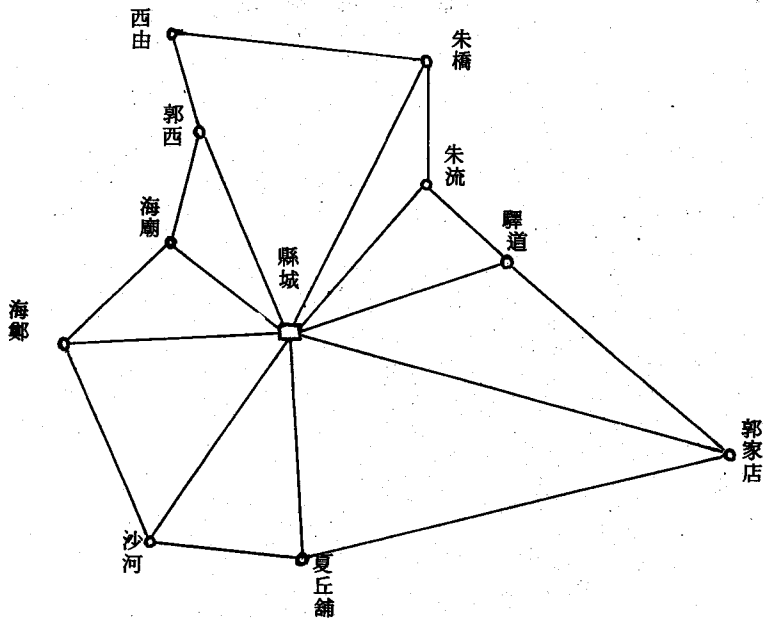
時期	人口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備註
洪武時期 (1368~98)	16,672人	7.10人	自1398年至1604年增長率 6.36%	人口數採自重刊萬曆萊州府志卷三， 頁10~11
萬曆32年 (1604)	61,560人	26.20人	自1604年至1906年增長率 2.77%	同上
光緒32年 (1906)	142,059人	60.45人	數字不確不予計算	人口數採自山東通志，華文本，第五 冊，頁2588
宣統2年 (1910)	756,168人	321.77人	自1906年至1920年增長率 84.82%	人口數採自劉國斌修掖縣志，卷五， 頁57下
民國9年 (1920)	444,103人	188.98人		人口數採自山東各縣鄉土調查，卷四， 頁62

表中人口數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相差極鉅，極有可能民國九年數字較為真確。人口增長率，

由於缺乏清代前期數字，故殊難看出其人口增長之高峯期究在何時，唯根據個人去年之人口研究，知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山東全省人口增加甚速，由此或可推知，清末民初時期，其人口增長即使非最高峯時期，亦應屬於增長較快時期，其人口密度如以宣統二年人口數為準，則高達三二一·七七人，如以民國九年為準，則亦達一八八·九八人，應屬人口稠密之區。其市鎮發展自亦應以此時為密集繁榮。

掖縣市鎮分佈及變遷，根據明代萬曆萊州府志記載，時計有城集十，鄉集九。其鄉集為沙河、郭西、西由、朱流、朱橋、驛道、郭家店、夏丘舖、海鄭、另有神會廟集二：海廟與雙山。（註七）其分佈約略如下圖。

由此圖形已可看出，在十六世紀後期十七世紀前期，掖縣縣城為全縣之中央市鎮地位業已形成。此中央市鎮形成之原因，主要在於縣城地理位置適中，及其又為全縣的行政中心。蓋掖縣縣城在交通上並不直接臨海，純粹因行政中心及地理位置上居全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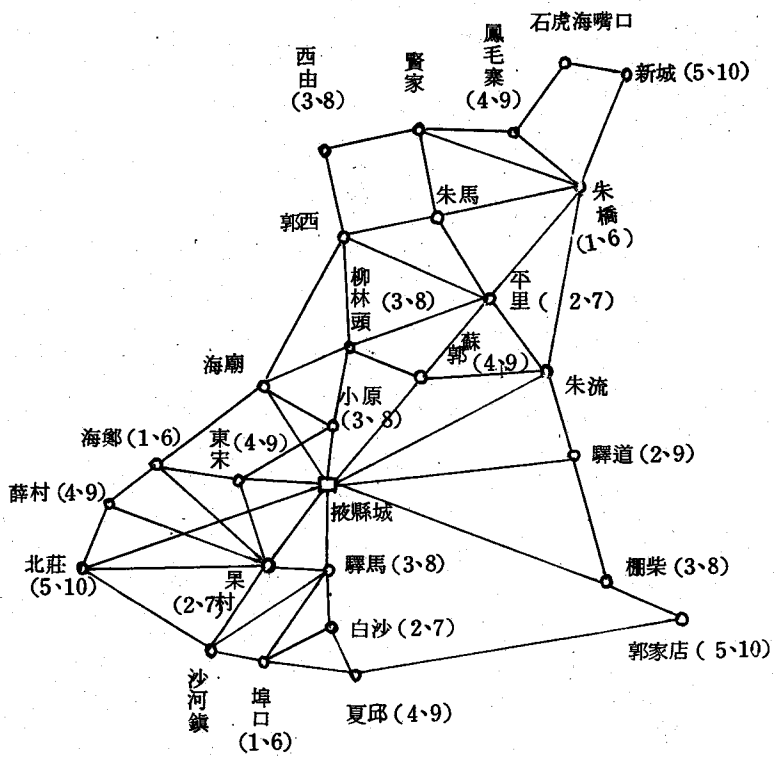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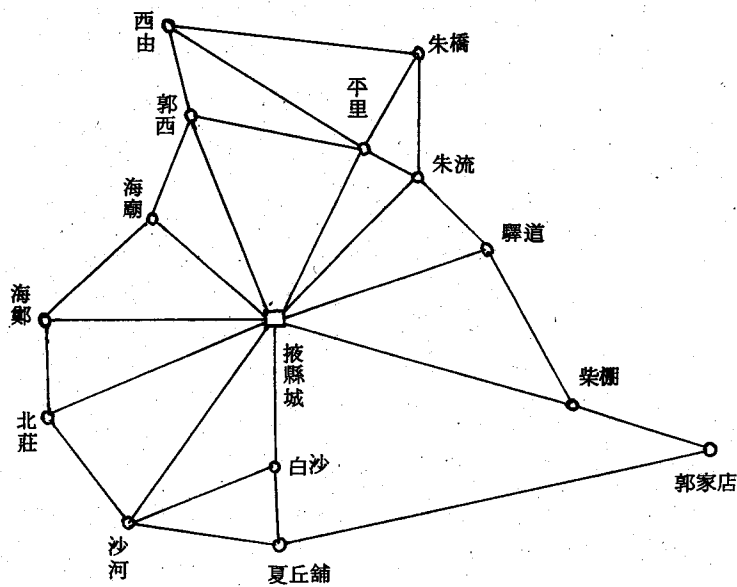
之中的關係，方使其市鎮結構以其為中心四向發展。其情況與金華府之永康縣、武義縣、浦江縣均極相似，或可視為行政中心及地理居中的位置是造成傳統時代縣城成為全縣中央市鎮之一項重要例證。

至於各市鎮距離縣城之里程，雖明萊州志中，未曾明白記載其里程，但據民國以後之地圖可測知，似上述諸市鎮大多分佈在七至十五公里（十四至卅華里）之間，（海廟距縣城約七公里，沙河約在十五公里）亦即步行一日可從容來回之里程。

據乾隆五年刊萊州府志，清初掖縣市鎮有所變動，城集減少為四，鄉集增加為十四，除原有之九市集外，另增：東安、北莊、白沙、平里、柴棚五市集。廟會神集仍然未變。（註八）此時期鄉集及廟會神集共十六，即每一四六·八八平方公里方有一市集，市集密度甚為稀少。

由下繪之圖形可看出所增加之市集，大多在十四至卅華里之間，亦即修補其已有之市鎮結構，使其十四至卅華里間市鎮圖益趨完整。茲後發展至光緒年間，其市鎮分佈及集期情形為頁五圖二。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五

根據此圖，可知市集密集度遠大於前，而且其集期均旬日間兩日爲集，各市集互相組織成小貿易圈，如驛馬（三·八）、白沙（二·七）、埤口（一·六）、夏丘（四·九）構成一小貿易集團。北莊（五·十）、海鄭（一·六）、杲村（二·七）及柳林頭（三·八）、蘇郭（四·九）、平里（二·七）各構成一貿易集團。其整個縣境內市鎮發展仍在充實其縣城至卅里距離內市鎮結構。此時期已有中間市鎮興起，如沙河鎮。其他西由、新城、郭家店亦逐漸形成爲中間市鎮。

由上述情形觀之，可知至光緒年間掖縣經濟情形已較前大爲繁榮。而且其繁榮地區在西南及北部近縣城平原地帶，至於東南山區則仍甚爲落後。一般而言，其此時期市鎮結構如與浙省金華府各縣相比，相差懸殊。

另根據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刊續掖縣志，可知全縣除縣城外，共有市集六四，平均每三六·七二平方公里（即一四六·八八方里）方有一市集，市鎮密度似已大於金華府屬在十九世紀末情況。唯各市集大小程度不知其詳，故而不可視此爲此時期掖縣經濟情況已較浙省金華府爲富裕。蓋此時掖縣市集稠密的原因，極有可能仍在於其人口密度甚高的關係。（註九）

廿世紀三十年代前後，掖縣市集中稱鎮者有西由、新城、平里、郭家店、夏邱、沙河、虎頭涯、朱橋八處，即平均每鎮包含有七市集。雖此類市鎮仍是有集期，而且旬日間兩日爲集，但在地位上應可視爲縣城以下的中間市鎮看待是無可置疑的。就集期言，此時期掖縣各市集仍均是旬日間兩日爲集。造成其旬日間僅有兩日爲集的原因，究係由於市集本身經濟力的不足，抑或純由於習慣使然，因無確切資料足以研考，殊難斷言。唯可以確定者，其旬日間僅有兩日集期，是與全縣市集密度高有相當相關性。蓋市集密度大，居民可往附近其他市集貿易，致而彌補其集期稀疏的缺陷。另一方面由於市集集期稀少才造成其小市集不斷興起，形成市集稠密之現象。蓋掖縣經濟情況在近代至現代時期，並無突飛猛進之發展，交通情況在公路未興修前，亦無太大改變，致而大市鎮不易興起，於是在人口不斷增加之情勢下，遂有大量小市集興起，以供其小地區人民日常生活之需要也。

另根據民國九年刊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掖縣當時共有村莊八六一，平均每二·七三平方公里（即一〇·九二方里）有一村莊，每村莊平均有五·一五·八〇人。如採全縣共有六四市鎮之說，（註一〇）每市集約服務一三·四五村莊，亦即服務六九三九·一一人。村莊密度遠高於浙省金華府各縣，市集對村莊之比例僅小於金華府武義（一：七·三三）、永康（一：九·二〇）、浦江（一：一一·五〇）、蘭谿（一：一二·六九）四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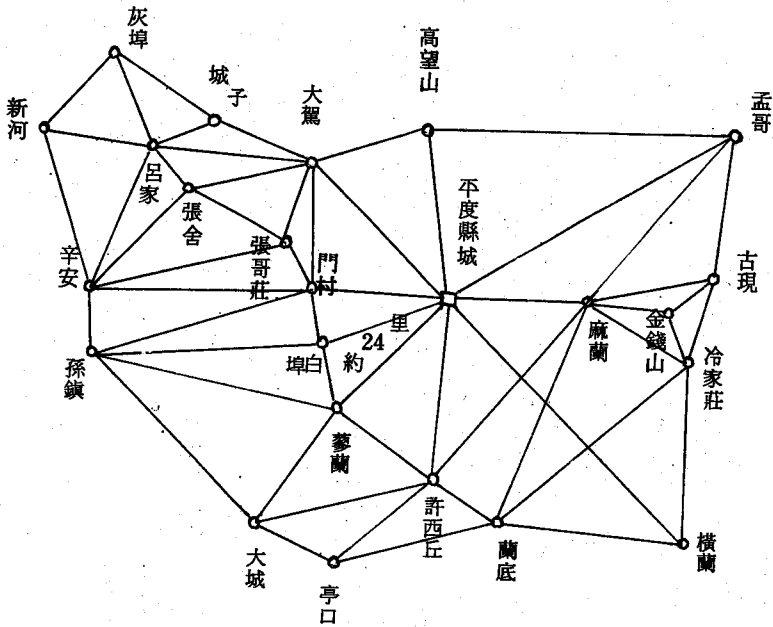
* * *

平度在元代稱膠水縣，明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方改爲平度州，下轄濰、昌邑二縣。清代在名稱上雖仍稱州，但因時地方行政區劃爲省、府、縣制，故其地位與縣相等。縣城原係土城，元末興築。明洪武二十二年改爲州時，乃重修，據載城周五里有零，高三丈，厚一丈五尺。明末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再改修石城，高厚皆加三尺。（註一一）故其縣治之確定，稍晚於掖縣。全境當膠萊地塹之中段，東北倚山東半島山地，其他均爲膠萊河平原，故地形北高南低。其四至，東西長一三五里，南北稍短，亦達一三〇里。縣城位置約當全縣之中，故在先天地理條件上，已使其縣城可成爲全縣之中央市鎮。全縣面積，根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約爲一萬六千方里，（註一二）即四千平方公里，大於掖縣。

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及增長情形如下表：

時期	人口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增長率	備註
洪武時期 (1368~98)	109,383 人	27.35 人	自 1398 年至 1604 年年增長率 2.84 %	人口數據萬曆刊萊州府志卷三，頁 10~11
萬曆 32 年 (1604)	196,352 人	49.09 人	自 1604 年至 1906 年年增長率 1.09 %	同上
光緒 32 年 (1906)	272,510 人	68.13 人	自 1906 年至 1920 年年增長率 60.07 %	人口數據山東通志，華文本，第五冊，頁 2588
民國 9 年 (1920)	616,703 人	154.18 人	自 1920 年至 1936 年年增長率 20.98 %	人口數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 68
民國 25 年 (1936)	859,736 人	214.93 人		人口數據平度縣續志，卷二，頁 52 下

日照莊（飛地在萊陽境）



由表中各數字，可瞭解平度在明代時人口密度遠大於掖縣，但一三九八年至一六〇四年間年增長率千分之二·八四卻低於掖縣之千分之六·三六。由此或可推知，在明代掖縣之開發速度高於平度。造成其開發速度較大之原因，極有可能是掖縣北部近海低窪地區，在近五百年間由於渤海灣之淤積，而漸變為良田，致而開發速度較快，人口增長亦較速。廿世紀初期，掖縣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八四·八二，亦高於平度之千分之六〇·〇九，其原因可能在掖縣距登州近，又隔海可與天津及遼東相聯絡，天津、營口、煙台開港，與遼東之繁榮，對其產生經濟較速成長之刺激作用，故人口增長亦較快速，乃至於人口密度大於平度。此種情形亦可由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時兩縣城商業情況得到明證。當時掖縣計有：銀號六八家，酒店三〇〇家，雜貨舖一二〇家，油坊一〇五家，藥房廿二家。（註一三）而平度祇有銀號十一家，雜貨舖二十家，藥房八家，油坊四〇家，（註一四）其商業情況遠比掖縣為落後。

平度在明萬曆年間，計有城集十，鄉集三一，廟會神集一，（註一五）平均每一二五平方公里（即五〇〇方里）即有一市鎮，其市鎮密度尙大於乾隆初年之掖縣。其市集分佈約略如前頁圖。

根據此圖，可看出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平度市鎮結構遠較掖縣爲發達。大體而言，此時平度市鎮結構已發展至有兩個環狀市鎮帶：高望山、大鴉、門村、白埠、蓼蘭、許西丘、麻蘭各市鎮，構成一內環市鎮帶，各市鎮均距縣城約二十至三十華里之間，此內環市鎮帶除東北山地發展不夠完整外，其他各部份均甚完整，而由高望山經大鴉、門村、白埠、蓼蘭至許西丘間，尤爲完整，各市鎮相互間距離除門村、白埠、蓼蘭間較近外，餘均在二十華里左右。其與中央市鎮縣城之關係，雖非爲規則之六角形，但仍然次序井然。其外環市鎮帶則由灰埠、新河、辛安、孫鎮、大城、亭口、蘭底、冷家莊、古現諸市鎮構成，距縣城約在五十至七十里之間，發展不及內環市鎮帶規則完整，其東北山地尤爲殘缺。顯然縣城對此市鎮帶影響力不及內環強大。至於日照莊、孟哥、橫蘭，此時期似應不在縣城經濟力直接影響之內。

另就其整個市鎮分佈而言，此時期市鎮密度以西及南兩面爲大，而東及北兩面則市鎮不夠發達。造成此一發展極不均衡之原因，誠如光緒刊山東通志云：

「東北皆山，西南就平地。」（註一六）
及平度州志云：

「……西通昌邑縣青州，爲赴京省孔道，以瓦廟口爲要津，龍王河爲內津，張哥莊爲重鎮，古莊毛果莊爲犄角，門村爲必由，昌邑之密城爲外蔽。其尤要爲王路，昌邑所轄，非平度所得及也。……南通膠州，爲膠州入府及商旅孔道，以吳家口孫家口爲要津，張奴河爲內津，蘭底爲重鎮，膠州烏店爲外蔽，郝家林爲必由。車行必由孫家口，雨濤盛則人騎由吳家口。」（註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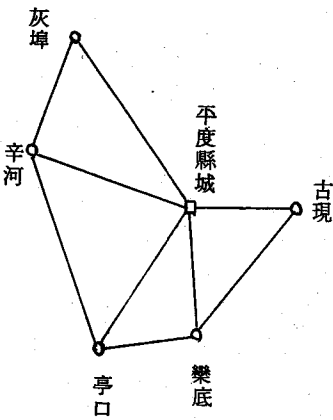
顯因東北兩面多山，西南兩面爲平原，又係赴北京及省城濟南與膠州之孔道關係。

根據康熙五年刊平度州志，其市鎮發展如下：計城集仍爲十。鄉集則有鎮三：亭口、古現、蘭底。店集廿四，山市四，共爲卅一。（註一八）與萬曆年間仍然相同。所不同者則亭口、古現、蘭底已明白稱鎮，應可視爲中間市鎮看待。由於三鎮皆在南與

東兩面，可知此一通膠州，高密及萊陽地區，因當交通孔道，而經濟較前略有繁榮。

清中期平度市鎮情形，根據道光廿九年刊平度州志，可知共有鄉集廿七，其中稱鎮者計有故現、亭口、蘭底、古縣四處，另有廟會神集六處。（註一九）市鎮在數目上，較康熙初年僅多一鎮古縣，市集少一，而廟會神集多二，其近兩百年間變動實甚微小。此種情形是與一六〇四—一九〇六年間人口增長率為千分之一·〇九相照合，可澄清在此時期內，平度地區由於經濟、交通情況未變，人口增長又甚微小，故其市鎮發展呈停滯現象。而在同時期內，掖縣市鎮增加甚速，兩者完全呈不同之情形。

及西力東漸後，由於煙台及德於青島（膠州灣）設租借地影響，平度市鎮結構方有突破之發展，根據民初記載，時全縣共分爲二八〇鄉鎮，其中縣城以外地區稱鎮者共有七九區，（註二〇）此類鎮區之首府雖難作中間市鎮看待，但應是較大之定期市集是無可置疑的。在此七九市鎮之中，除過去舊志所載之市集大多稱鎮外，其他新興市鎮大多集中於東、南、西三方面，亦即平原及通膠州萊陽孔道之區，北部通掖縣處則較稀少。



今雖因缺乏詳細地圖，無法確定其位置，但由此籠統事實，已可看出近代青島（膠州）及煙台（登州）開港對其經濟及市鎮結構之影響是遠大於府城掖縣的。茲根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可知至民國初年，平度共有重要市鎮五，即辛（新）河、灰埠、樂（蘭）底、亭口、古現五鎮，此五市鎮應是在經濟上已發展至中間市鎮階段。其分佈位置恰當西北、西、西南、南、東各方（見圖），與萬曆年間之市鎮結構仍然相同。

因此我們或可作如此結論：平度地區之市鎮結構實定型於十七世紀初年，近代青島及煙台的開港雖對其平原地區及通膠州灣與山東半島走廊地帶市鎮興起有相當影響力，但尚未造成其市鎮結構的全面改變，然已破壞府城與縣城間為市鎮密集區（見浙省金華府）之說。

平度於民國初年時，共有村莊一、六三二，（註二一）平均每二·四七平方公里（即九·八六方里）即有一村莊，每村有三八〇·二一人，村莊密度與掖縣相仿，每村所有人口則不如掖縣衆多。此後至民國廿五年，共有村莊一、七七一，人口八五九、七三六人，（註二二）平均每二·二六平方公里（即九·〇三方里）有一村莊，每村平均人口為四八五·四五人，每村平均人口仍不及掖縣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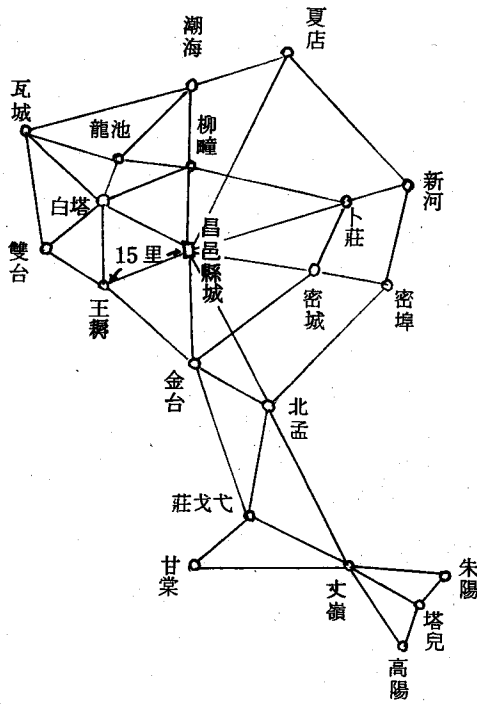
*

*

*

昌邑古稱都昌，宋以後用今名，並於原縣治之東築土城為治。明正德六年（一五一二）因流賊之變，重新修建縣城，後復多次因水患有所遷建，今城建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自十七世紀中期起，縣治及縣城範圍方告完全確定。全縣位於膠萊地壘之北部，幾全為平原，其四至：北臨海，西至濰水，濰水與濰縣相接，東隔膠河與平度相鄰，南接高密與安邱，呈一南北長東西窄之狹長形狀，縣城臨濰水，處於極西，唯南北尚管全縣之中，故其地理位置仍有利於其中央市鎮之形成。全境面積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載，計一萬三千五百方里（三、三七五平方公里）。自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及增長率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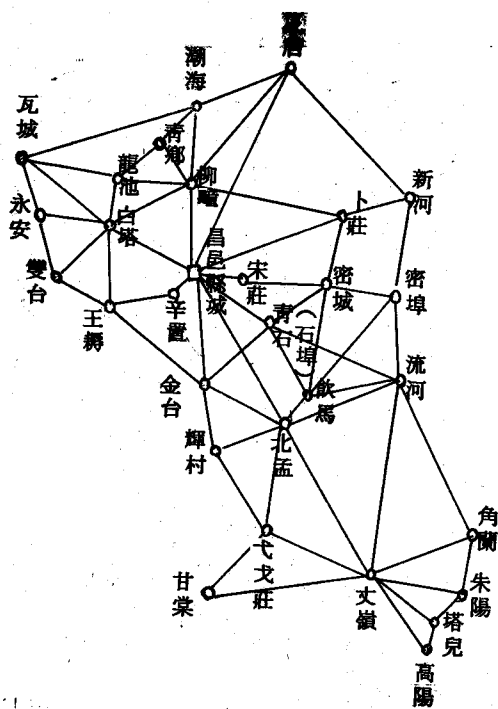
時期	人口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備註
洪武時期 (1368~98)	135,420人	40.12人	自1398年至1604年年增長率 —1.22%	人口數採乾隆7年刊昌邑縣志，卷三，戶口
萬曆32年 (1604)	105,289人	31.20人	自1604年至1906年年增長率 5.39%	同上
光緒32年 (1906)	532,981人	157.92人	自1906年至1920年年增長率 —0.9%	人口數採山東通志，華文本，第五冊，頁2588
民國9年 (1920)	526,304人	155.94人		人口數採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81



。在如此情況下其人口何能有所增加？（註二三）光緒卅二年至民國九年間人口相差僅及六千餘人，極有可能係因人口數字記載不夠詳確，或青島都市化作用的結果。

明萬曆時期昌邑計有城集五，鄉集廿八，神集一，（註二四）其鄉集分佈約略如本頁所附之圖。

由上表可看出昌邑人口所呈現的情狀與掖縣、平度不同，即洪武時期人口數尚多於萬曆年間，故其在洪武至萬曆卅二年間人口年增長率是負千分之一·二二。萬曆至光緒時期三百零三年間，人口年增長率千分之五·三九，約略接近何炳隸書中所言此時期我國平均年增長率千分之六·四。而光緒卅二年至民國九年間，人口年增長率復呈負千分之〇·九。造成昌邑人口如此波動之原因，主要在於兵燹與天災。就兵燹言，昌邑沿海於洪武年曾受倭寇之擾，正德年間復有流賊之變，其中流賊之變騷擾尤烈。天災則以水災為烈，如永樂八年濰水泛濫，曾決百十三所，昌邑受災甚重。嘉靖四年大雨成災並有瘟疫，此後水旱蟲災幾乎不斷，直迄萬曆年間



由此圖可以清楚看出在萬曆年間，昌邑的市鎮發展是如同平度，已形成了內外兩個市鎮環，其內環係由市集王禰、白塔、柳疃、卜莊、密城、金台所構成，形成一六角形。各市集距縣城的距離約十五至三十華里（亦即七至十五公里）之間；其外環係由雙台、瓦城、潮海、夏店、新河、密埠、北孟所構成，因昌邑縣城西南緊臨濰縣，故其外環北孟至雙台間並不在縣境之內，外環各市集距縣城約在五至七十華里（亦即廿五至卅五公里）之間。由於昌邑縣西北及西兩面恰當通濰之孔道，而縣城位置又較偏西，故兩個市鎮環均呈西半部市集較密集，距離縣城亦較近，而東半部則市集稀疏，距縣城亦較遠。至於北孟以南諸市鎮，由於距縣城過遠，似應不在縣城經濟力影響之內。因當通高密之孔道，其與高密之經濟關係應遠大於縣城。故在經濟上縣城顯然僅為北孟以北諸市集之中央市鎮。要而言之，昌邑之市鎮發展在十七世紀初年是與平度大體相同，已形成了相當完整的兩層市鎮環，甚至其市鎮環的結構較平度尤為完整。

此時期昌邑市鎮的密度，如以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所載面積計算，計每一一六·三八平方公里（即四六五·五二方里）方有一市集，稍大於平度。

根據乾隆七年刊昌邑縣志，可知至十八世紀初期，昌邑市鎮發展情形如下：城集減為三，北街集及西宮集已廢。鄉集則為：東鄉十，南鄉十一，西鄉八，北鄉六，共為卅五，另廟會增為八處。（註二五）計每七八·四九平方公里（即三一三·九五方里）即有一市集。市鎮密度已大為增高。其分佈情形如本頁右圖。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由上圖可以看出所增市集多在東南、西及南方。西及南方所增市集如辛置、永安、輝村，並未改變其市鎮結構，而東南方由於流河、角蘭、飲馬、青石的興起，使其市鎮結構發生相當急劇的改變。流河與角蘭兩市鎮的興起，使原不屬於縣城經濟力影響的東南市鎮區與縣城間聯絡較密，而丈嶺則成爲此市鎮區的中心。流河、北孟與輝村則成爲此區與原有之外環市鎮帶相聯之重要據點。由於飲馬及青石的興起，則使東南部原外環市鎮與內環市鎮間有密切聯繫，飲馬並成爲其中心。於是形成自西北而東南各以縣城、飲馬、丈嶺爲中心相接的三個多角形市鎮區。如再加上白塔爲中心的極西北市鎮區，則全境市鎮區由西北而東南共有四個之多，祇是白塔爲中心的市鎮區與縣城爲中心的市鎮區有部份相重疊處。此一市鎮結構與清初浙省金華縣極爲相似，祇是各區市鎮所構成之圖形僅白塔與縣城爲中心者約略呈六角形，而其市鎮密度似尚大於金華縣。故就市鎮密度言，清初的昌邑是應較金華縣稍有進步的。至於其市鎮結構爲何不能成完整相連之六角形，極有可能仍在於河流細小、稀少，水運交通不及金華發達，再加以地形、經濟力及人口密度的因素，致而其中間市鎮不甚發達，市集的位置亦各有不同。由此可知，Christaller 及 Skinner 的理論仍是受有其地形、人口、經濟力與交通諸因素的限制，並非所有平原市鎮皆有出現完整六角形之可能。

清末昌邑市鎮結構發展之情形，由於缺乏縣志，茲根據宣統三年刊山東通志中昌邑縣圖所載稱集稱店稱舖稱鎮者，共有四八，較清初增加五處。（註二六）計每七〇·三一平方公里（即二八一·二五方里）有一市集。而民國九年刊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共有村莊八三八，（註二七）則平均每四·〇三平方公里（即一六·一一方里）有一村莊，每市集服務一七·四六村莊。如以人口爲五二六、三〇四人計算，則每村平均有六二八·〇五人，每市集服務約一〇、九六四·六九人。如將之與平度、掖縣相較，則在廿世紀初期，其村莊密度遠小於平度、掖縣，但仍稍大於同時期之金華縣，唯每村平均人口數稍高於平度、掖縣。市鎮的密度小於掖縣，但較金華縣仍然爲高。故在市鎮的形態上，昌邑是與掖縣相近：即村莊密度大，市鎮多，每市鎮的經濟能力反而較小，較大的中間市鎮不易興起。此時期昌邑較重要市鎮，根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計有：柳疃、下營、王藕、丈嶺、北孟，此五鎮應可作爲中間市鎮看待。（註二八）其市鎮結構圖約略如次頁。

根據圖示，可看出由十八世紀中期以後至廿世紀初期百餘年間之昌邑市鎮發展，主要在距縣城五至十里處，有一市集環之興起。此一市集環興起的原因，或可解釋爲：由於縣城近郊人口增多，而在縣城本身經濟力未十分增強情況下，遂乃有不少小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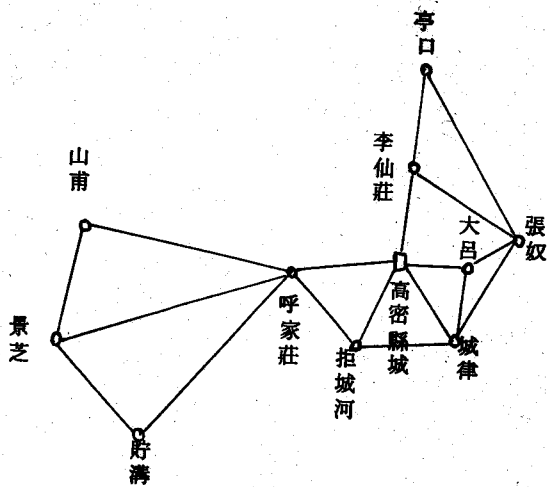
高密、膠州與即墨在地理上與前述之掖縣、平度、昌邑三縣地區有所不同，皆位於膠萊地壑之南部，在傳統時代對外關係上，受膠州灣之影響遠大於渤海灣。及青島開港，德人修建膠濟鐵路，更增強此一趨勢。濰縣在地理上雖屬膠萊地壑之北部，但因地居濟南通青島、煙台要道之樞紐地位，而膠濟鐵路通車後，更成為山東中部物產聚集經鐵路運往青島之中心。與上述三縣關係亦趨密切。故及二十世紀初期，此四縣因青島興起及鐵路交通關係，在萊州府中已互相密結，單獨成區，與上述三縣關係漸疏遠，甚至取代上述三縣地位，而成為膠萊地壑之主體。此外更由於青島之急劇都市化，使人口亦逐漸向本地區集中，而各項現代化觀念及建設更由青島經本地區而向其他地區推進，成為山東省現代化觀念萌芽較早的地區。

高密其名稱最早見於戰國，西漢以後即設縣，或屬膠州或屬青州。（註二九）明以後方屬萊州府。（註三〇）其近代縣城初築於元，至明嘉靖二年（一五二三）改建磚城，始告定型。故縣治確定約略早於掖縣。（註三一）其全境南北兩部東西較短，而中部東西較長，故雖非屬正方形，然亦尚稱四至適中。唯縣城位置雖居於中部，但偏向東部近膠河處。故就地理形勢論，似較難形成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全縣面積，根據民初刊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共九千二百方里（約二千三百平方公里）。其自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增長率如次頁表所示。

由表中人口密度數字可看出在明代其人口最大密度在弘治五年，時每平方公里有四二·七三人，較洪武廿四年四〇·七〇人高出不多。此後一再降低，至萬曆卅年，僅有二五·六一人。由洪武廿四年至弘治五年，此百年間人口密度增加有限，主要是因永樂至宣德年間人口數字甚低。造成當時人口數字甚低的原因，則在於靖難之役與永樂十八年的大飢。（註三二）正德年間人口密度的降低是受流民劉六之亂影響，（註三三）嘉靖、萬曆年間人口密度小則與倭寇騷擾，連年災荒有關。（註三四）其於萬曆卅年的人口密度約與萬曆卅二年掖縣（二六·二〇人）相仿，此一現象或者可說明當時高密經濟情況約與掖縣相當。高密人口年增長率所呈現之情況，大約尚能與上述人口密度發展之情況相配合。所不同處在天順五年至成化七年間（一四六一至一四七一）人口增長率極高，年達千分之三二·二三。此一較高人口增長率或可說明在災荒動亂之中，此十年高密地區尚稱安全，故人口急增，繼而因此造成至弘治五年（一四九三）人口密度在明代為最高。其由一三九一至一六〇二年間整個時期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負二·一九，較同時期掖縣年增長率千分之六·三六，相差甚遠。由此或可了解，本地區在此二一一年間甚少發展，致使其地

年 代	人 口 數	每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洪武 24 年 (1391)	93,615 人	40.70 人	
永樂 10 年 (1412)	76,122 人	33.10 人	- 9.8 ‰
宣德 5 年 (1430)	59,133 人	25.71 人	- 13.93 ‰
天順 5 年 (1461)	68,346 人	29.72 人	4.68 ‰
成化 7 年 (1471)	93,862 人	40.81 人	32.23 ‰
弘治 5 年 (1492)	98,288 人	42.73 人	2.20 ‰
正德 5 年 (1510)	73,180 人	31.82 人	- 36.20 ‰
嘉靖 11 年 (1532)	73,615 人	32.01 人	- 0.27 ‰
隆慶 5 年 (1571)	54,900 人	23.87 人	- 7.49 ‰
萬曆 10 年 (1582)	56,081 人	24.38 人	1.94 ‰
萬曆 20 年 (1592)	55,800 人	24.26 人	- 0.5 ‰
萬曆 30 年 (1602)	58,900 人	25.61 人	5.42 ‰
順治初 年 (1646)	72,564 人	31.55 人	4.75 ‰
康熙初 年 (1664)	81,170 人	35.29 人	6.25 ‰
康熙 50 年 (1711)	88,181 人	38.34 人	1.76 ‰
乾隆 14 年 (1749)	92,282 人	40.12 人	1.20 ‰
嘉慶初 年 (1798)	217,187 人	94.43 人	17.62 ‰
道光初 年 (1823)	231,010 人	100.44 人	2.47 ‰
咸豐初 年 (1853)	253,081 人	110.04 人	3.05 ‰
同治初 年 (1864)	297,688 人	129.43 人	14.87 ‰
光緒初 年 (1877)	339,366 人	147.55 人	10.13 ‰
光緒 21 年 (1895)	370,808 人	161.22 人	4.94 ‰
宣統初 年 (1911)	420,085 人	182.65 人	7.83 ‰
民國 23 年 (1934)	506,419 人	220.18 人	8.16 ‰

備註：1 資料來源：高密縣志，民國二十四年刊本，成文重印本頁 281 至 285。
2 文中稱初年者均定作為三年，以便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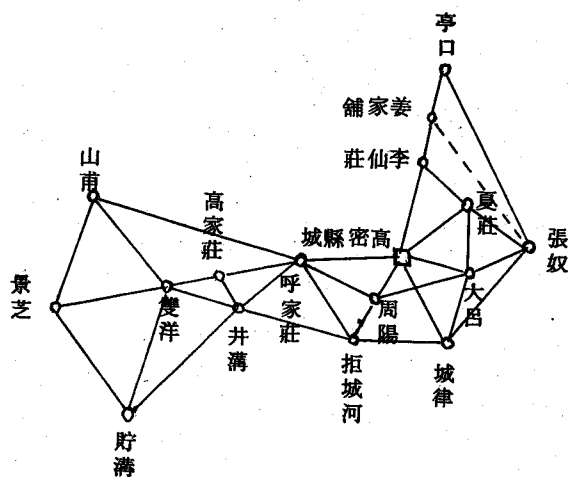


區原在洪武年間已甚發達之情況，停滯不進，而掖縣則在此時期發展較速，於是兩縣之間差距予以拉近。

高密在清代的人口發展情況遠好於明代，至宣統年間人口密度已增至每平方公里一八二·六五人，高於明代弘治五年時達三·二八倍。由順治初年至宣統三年（一六四六至一九一一）此二百六十五年間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六·六五，亦遠好於一九一至一六〇二年之千分之負二·一九。因此可知清代高密地區的發展，僅就人口增長情況而言，實高於明代甚多。清代人口密度最好時期雖在宣統年間，但其人口年增長率高峯期則有二：一在乾隆十四年至嘉慶初年（一七四九至一七九八）。此四十九年間人口年增長率達千分之一七·六二，與一般說法：乾隆至嘉慶年間我國人口增加甚為快速之說相吻合，另一在咸豐初年至同治初年（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四），高達千分之一四·八七；此與太平天國之亂時期本地區未甚受亂事騷擾，避亂者多來此有關。亦與個人去年研究報告山東省在此時期內人口急增之說相吻合。其光緒廿一年以後至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間人口增長率在千分之七·八三至千分之八·一六之間，

數字不大。此時期人口的增長應與鐵路的修建有關。但如將之與掖縣、平度兩縣相較，則年增長率相差甚遠。（掖縣一九〇六至一九二〇年增長率為千分之八四·八二，平度一九〇六至一九二〇為千分之六〇·〇七，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六為千分之二〇·九八。）究其原因何在，是由於人口數字不正確，或其他因素，則猶待進一步研討。極有可能本地區受拳亂及德軍騷擾遠較非鐵路沿線之膠萊北部地區為烈。縣志中曾明白記載，光緒廿六年時，德軍佔據縣城，縣境受德軍焚殺甚慘。（註三五）

至於高密之市鎮發展情形，根據萬曆年間到萊州府志記載，時計有城集六，鄉集十二，鄉集分佈如本頁所附圖。



根據此圖可以看出，其鄉集分佈以縣城以南以東地區較密，而縣城西北地區由於係湖泊淤積之沼澤地帶，則市集稀少。大體而言，此時以縣城為中心之市集網已初步形成。此市集網係由呼家莊、拒城河、城律、張奴（張魯）、李仙莊諸市集所構成。其市集網距縣城約在三十華里（即十五公里）之內。而山甫、景芝與貯溝因距縣城在五十、六十里以外，顯然受縣城經濟力影響甚微。亭口距縣城約四十里，故雖非在此市集網內，可說仍是受有強烈之縣城經濟力影響。此時期市集密度是：一九一·六七平方公里方有一市集，市集密度甚為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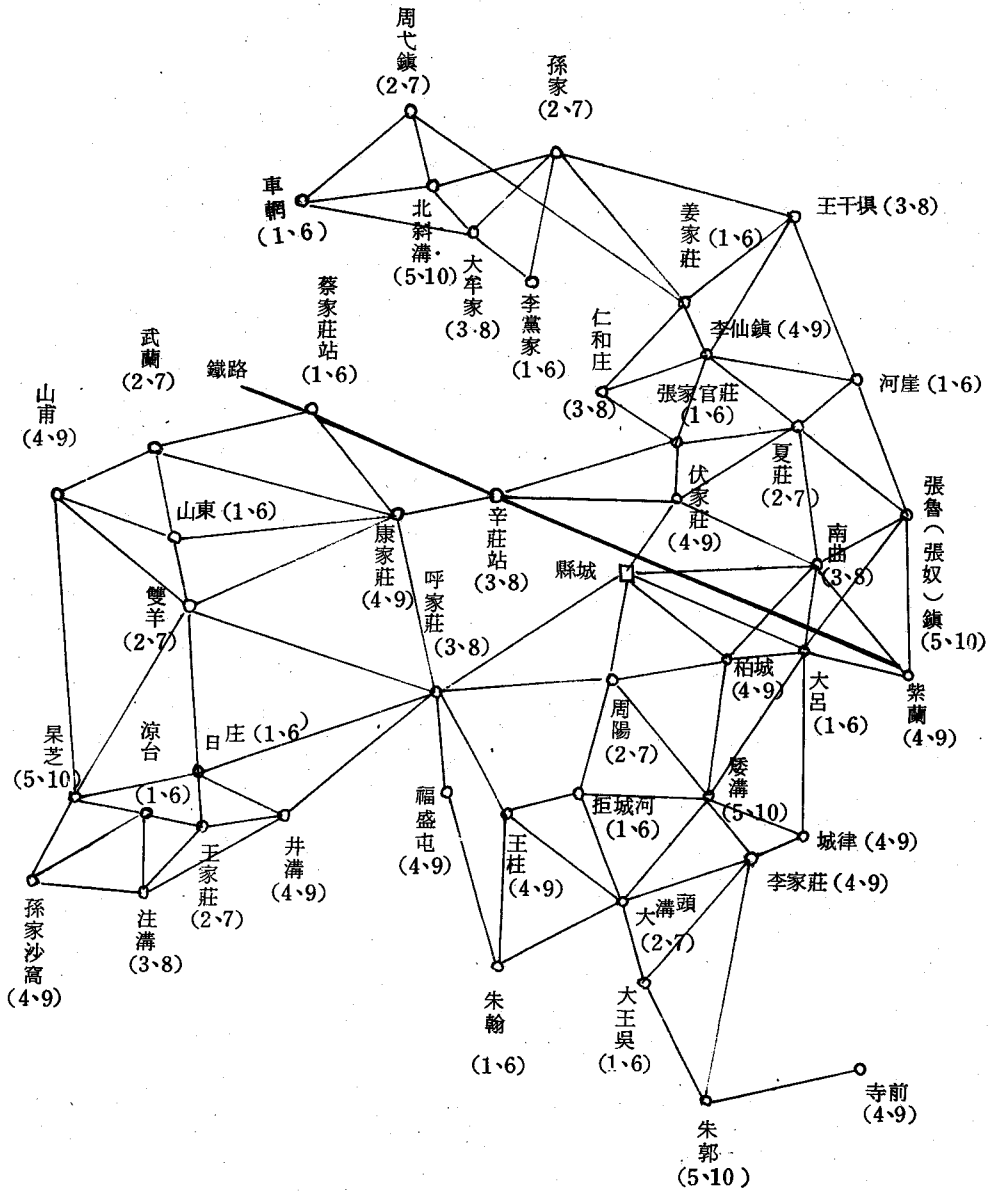
另據萬曆刊萊州府志記載，當時之社會經濟情形是：「土地頗僻，人民務本，婚喪稱有無以為禮。」（註三六）「地居瀕海，舟車不通，士亦好學，有勤儉儒素之風。」（註三七）顯然交通與經濟均不夠發達，是當時的落後縣份。

清初高密市集有所增加，計有鄉集十八，城集則減少為四。其鄉集分佈情形如上圖。

由此圖可看出清初市集發展的情況在：（一）增強西部景芝、山甫、貯溝市集區與縣城的聯絡，故有井溝、高家莊、雙洋市集的興起。（二）在原有以縣城為中心之市集網內因周陽、夏莊等市集的興起，有逐漸再形成一內市集網之傾向，至少如將周陽、大呂、夏莊相聯絡，已可發現此一內市集網東部及南部業已形成。（三）原有之市集網因姜家舖之興起，在北方已逐漸向外擴張，而亭口受縣城之影響亦益為增強。

清初高密縣的市集密度是每一二七·七八平方公里有一市集，較萬曆時期已密度增大。

至於廿世紀前期市集情形，茲根據民國廿四年所刊縣志，得知全縣有城集五，鄉集六十五。（註三八）在此六十五鄉集之中，計有重要市鎮四：井溝、夏莊、呼家莊、景芝鎮。其鄉集分佈情形如下頁圖。



由上圖可以看出：一至廿世紀初期，高密的市场密度遠大於清初十八世紀初期，此時期市场密度是每三五·三九平方公里即有一市集，較清初二二七·七八平方公里方有一市集，高出二·六倍。而且縣城以北，及縣境南端市集網有快速之發展。二雙羊以西之市集區已與縣城聯為一體，即縣城已正式成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三由於鐵路自紫蘭入境，約呈東南西北走向，至蔡家莊站橫貫東西，故縣城以北之市集帶形成頗受鐵路交通影響。其西部鐵路以南地區，雖市集稀少，但就縣志所附地圖可知，該地區村莊甚密，極有可能此類村莊中有不少市集正在形成之中，或業已形成小市集，祇是縣志中未曾記載罷了。四各市集市期均為每旬日間二日為市，而造成旬日間二日為市之原因，極有可能是由於人為的習慣使然，絕非是純出之於經濟因素。蓋如純出之於經濟力使然，則其中應有每旬日間三日為市者，或甚至四日為市者，絕不可能如此整齊劃一。五由於各市集均旬日間兩日為市，故密集之小市集網甚為發達，但發達程度尚未及五小集構成一市集網。大多是三市集成一集團，如李仙鎮（集期四、九），張家官莊（集期一、六），仁和莊（集期三、八）構成一集團。故其市集商販貿易情形是每旬日間僅貿易六日，休息四日。由此或可推知，其交通及經濟情況均仍不夠發達，但已較掖縣、平度、昌邑高出甚多。故其原有以縣城為中心之市集環狀網業已完全打破。廿世紀初期，高密市集之所以能繁盛，極有可能仍在於鐵路之興建，致而增強其經濟力，改變其原有之交通結構，遂造成其市集有突破之發展。

至於高密地區市集與村莊及人口之關係，由下表可得知其梗概：

市集數	65	村莊數	1,031	全縣面積	2,300km ²	全縣人口數	411,424人
每市集服務村莊數	15.86村	平均每村人口	399.05人	村莊密度	1村 / 2.23km ²		
每市集服務人數	6,329.6人			市集密度	1市集 / 35.39km ²		

資料來源：市集數取自民國廿四年刊縣志，人口數及面積與村莊數取自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

如將表中數字與掖縣、平度、昌邑三縣相較，則市集服務村莊數，低於昌邑，高於掖縣。每市集服務居民數則為最低。村莊密度則最大，平均每村所有居民數亦最低。諸此均可證明高密在廿世紀初期在膠萊地區情形是：村莊較為稠密，市集發達服務人數甚低。

至於高密縣城本身因鐵路興建之逐漸改變情形：由於鐵路不直接經高密城，其站設於城外東北兩里處，故東北城廂商業發達，特別是東關一帶因係通車站之孔道，各業均極繁盛。城廂共有商店二百餘家，人口一萬人。其對外貿易，出口以農產花生、豆油、小麥、棉花、生油為大宗。出口貿易金額於廿世紀三十年代時年達三百零七萬五千元。其中花生仁一項年輸出二千萬斤，金額達一百二十萬元，（註三九）占出口貿易金額百分之三九·〇二。如再加上花生、生油兩項，則共一百八十四萬元，占出口總金額百分之五九·八四。可知高密對外輸出是以花生產品為大宗。輸出地點則為青島、上海。（註四〇）新式工業計有：電燈公司一、麪粉廠一、染織廠一、織帶廠一、紡織廠四、鐵工廠四。（註四一）顯然其工業化已開始萌芽，所設各新式工廠仍以提供當地所需為主。

高密城廂在貿易上仍保有集市形態，其集期是旬日間兩日為市。城廂南關一帶係糧食、魚肉、蔬菜等城市本身日需之貿易場所。而全城商業重心在東關一帶，有新式馬路通火車站，重要工商業均集中於此。可謂是全城現代化重心所在。城內則多官衙，與浙省金華府溫州府各縣相同，變動殊小。由此可證明，我國城市之現代化並非是由城內生長，而往往是因現代化交通設施的興起，使其接近現代化交通設施處，首先發生變遷。再加以此類現代化交通設施每設於原甚荒涼處，並不經過城內，故其城市現代化及都市化的急劇發展地區亦多在城外，而逐漸與傳統之城市本身融為一體。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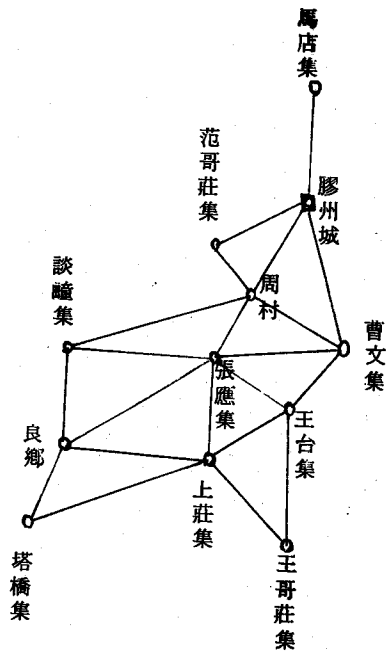
膠州，在西漢時為膠東國之一部份，東漢時稱菑廬，宋以後為膠西縣，元時始置膠州。明時以膠州為高密，即墨地區最高地方行政單位，下轄高密、即墨兩縣。清則因廢州設地方行政制度，使其與縣相等，故膠州治境之確定，實在於明清兩代。民國以後則改稱膠縣。（註四二）膠州城原在今治西北里許之土城，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因兵亂城廢，移今治。明洪武八年（一三七五）築磚城，後於正德年間毀於流民之亂。萬曆年間再予重修，後復毀於水災及地震。今城重修於道光廿四年（一八四四）。故其

縣治城池確定甚晚，約在十九世紀中期。（註四三）全境位於膠萊平原之南端，南北長東西短，西北部東西尤短。縣城位於北部中心地帶，故就其地理位置言，殊難成爲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全縣面積一萬零二百五十方里，即二、五六二·五平方公里。其地形西南一帶地勢高亢，東北平坦，東南地勢低窪。其自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及年增長率如下表：

時 期	人 口 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洪武時期（1368～98）	123,486人	48.19人	
萬曆32年（1604）	120,810人	47.15人	— 0.11%
光緒32年（1904）	249,548人	97.39人	2.42%
民國9年（1920）	510,526人	199.23人	45.75%

資料來源：明代人口資料取自萬曆32年刊萊州府志，清代人口數取自光緒32年刊山東通志，民國資料取自民國9年刊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

由表中數字可看出在明代二百多年間，膠州地區人口情況非僅停滯不進，反而尚略有倒退現象，其萬曆卅二年人口密度不及洪武年間，人口增長率亦爲負數。唯將其數字與高密相較，則可發現情況好於高密。故至萬曆卅二年時，人口密度仍高於高密甚多。造成膠州地區在明代人口停滯不進的原因，根據膠志之大事紀，可知是在於倭寇及流民之亂。（註四四）倭寇自洪武七年（一三七四）起，即不斷寇擾本地區。故倭寇侵擾對本地區之影響，似較流民之亂更爲強烈。清代因缺清初人口數字，故無法知其人口變化實況。唯根據膠志大事紀，可知由順治迄嘉慶年間，本地區仍時受饑荒與海盜侵襲，故至光緒卅二年間其人口年增長率，依然甚小，低於何炳楙書中所言一七九七至一八五〇年間我國平均年增長率千分之六·三。光緒卅二年至民國九年間膠州地區人口年增長率甚高，達千分之四五·七五，遠高於高密地區。造成此一現象之最大原因，當然在於鐵路之興建，與青島成爲我國



巨都之一之影響。由其與高密人口年增率之差距（兩者相差達五倍以上），已可看出青島都市化作用，對本地區影響實遠大於高密。此與本地區是青島的附郭地帶，而高密距青島甚遠有關。

至於其市鎮之發展，據明萬曆卅二年刊萊州府志，當時膠州共有城集五，鄉集十二。（註四五）其鄉集分佈如本頁所附圖。

根據此圖，可知在十七世紀初年，膠州市集的密集之區，主要在膠州城南部及西南部，東部及北部市集不發達。造成此一現象的主因：一是東部近海，因倭寇騷擾，沿海不靖，故雖州城近海，反而對外交通不便，居民亦稀少，經濟落後，至乃缺少市鎮興起。由此可證明，我國在十六七世紀市鎮的發展，主要在於內陸，而邊海地帶則因治安不良，反而落後。其情形與浙省溫州、台州地區相仿。一是因北部與平度、萊陽接近，至平度境僅四十五里，而馬店恰處縣城以北之中心位置，此一地區河流甚多，地勢低平，有水患，一時間市集亦不易興起。至於縣城以西地區，則距高密縣紫蘭僅廿五里，故市集亦少。概括言之，由上繪之市集圖，可了解此時期市集密集地區主要為地勢較高亢遠海處，蓋既可無水患，又治安比較良好故也。縣城因不在此市集區之中心位置，顯然並非是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其以縣城為中心之市鎮帶並未形成。此種情形在傳統時代甚為少見。蓋傳統時代經濟落後，交通不便，縣城因其政治地位突出，故一般情況，應均是全縣之政治及經濟中央市鎮。膠州此種情形究竟是因其設治較晚之關係，抑或原亦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後受倭寇、海盜騷擾及水患諸因素影響，致而有此特殊發展，因缺明初資料加以比較，故不敢肯定斷言。但如以浙省溫州及台州情形而論，其邊海處在明初原亦有市集發展，後純因倭寇及海禁因素影響，致而其市集發展較為遲緩，甚至原有之市集亦多廢棄。膠州情況或者亦屬於此一類型，祇是無資料可加以證明而已。清初膠州市集發展情形，據乾隆五年刊萊州府志，仍作城集五，鄉集十二，而且名稱均同，（註四六）顯然係抄錄萬曆卅二年刊萊州府志者，其當時真正情況不明。或者由此可以反證此時期市集無大發展，故府志中仍因沿舊說，未曾加以修正。

由此圖可以看出，膠縣全境在經濟上計有兩個中心，一為北部之縣城，一為南部之王台。膠縣城之市集網約可分為內外兩層，其內層由李家河、十里鋪、斜馬墳、馬店、大王店庄、達家庄、辛置、三里河所構成。距縣城約在三至十里間。其外層則由小麻灣、三十里鋪、閘子、茅家屯、大西庄、塔埠頭、馬家村、辛店、十五里疃、王家屯、杜村、馬尋莊所構成，距縣城約在十五至廿里之間。因鐵路由東而西橫貫縣城之北，故縣城以東鐵路兩側市集特密。並有在外層市集圈再形成一市集圈之形態。縣城以西則因距縣界太近，故市集並不如縣城以東發達。但將來勢必如縣城之東，於東南一帶再形成一市集圈。

其以王台為中心之縣境南部市集圈亦約可分為二層，其內層係由馬其河、洋河城、冷家村、張營、里岔、墨得水、鄭廟、店子、台上所構成，距王台約在十至十五里左右。其外層由辛店、王家屯、耿家庄、良鄉、徐前疃、店子、滴水巷、王樓、王哥庄、煙台、靈山衛、辛安、紅石崖、塔頭埠、馬家村所構成，距王台約在三十里至四十里間。王台為中心之市集圈其市集密度顯然不及縣境北部以縣城為中心之市集圈。此蓋因縣城本身之經濟力與鐵路之交通力均大於王台及一般傳統陸路交通力故也。此南北兩部市集圈於馬家村、辛店、王家屯相接觸。

由上所述，可以得知膠州縣城不能成為全縣之中央市鎮，與其地理位置深有密切關係。由於其地理位置過於偏北，致使其在傳統時代，經濟力與交通力未有突破發展時，無法克服此一先天的缺陷。故縣城之能否成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在傳統時代是深受其地理位置影響的。

至於王台能成為縣境南部經濟中央市鎮，在廿世紀初期實在於沿海對外交通發達。於是在此地區東及南兩沿海地帶有大量市集興起，使其逐漸發展成為縣境南部之中心。此一情形如將民初市集圖與萬曆年間市集圖相比較觀之，可以清晰得見。甚至縣境北部東境之市集密集亦受有此一因素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如此結論：明及清初倭寇海盜騷擾及海禁政策是造成膠州沿海地區市集不發達一項根本原因，但及十九世紀後期及廿世紀初期，海禁大開，海上交通發達，遂使沿海地區市集興起之速度遠大於距海較遠地區，其情形與浙省之台州府、溫州府完全相同。當然，沿海地區市集興起較為快速之情況，在某一方面言，自亦是一種承受西力衝擊後所發生之近代化現象。就本地區而論，青島之形成巨都，所產生之強大都市化作用應亦是一項不可忽視之因素。

至於廿世紀初期膠縣市集集期，由於縣志中未有說明，故難得知其詳情。但根據上述之市集結構圖，可以了解，仍是以三市

集構成之小三角形為基礎。極有可能，其市集集期是與高密相仿，每旬日兩日為市，而較大市鎮如王台、張蒼以及縣城均仍保有市集兩日為市之形態。蓋兩縣之經濟力約略相同也。至於六角形市鎮結構，本地區與高密、平度、掖縣相同，並未出現。

膠縣地區在廿世紀初期市集、村莊與人口之密度關係，由下表可知其情況：

市 集 數 57	村 莊 數 1,225	全縣面積 2,562.50km ²	全縣人口數 510,526人
每市集服務村莊數 21.49村	平均每村人口 416.76人	村莊密度 1村 / 2.09km ²	
每市集服務人數 8,956.60人		市集密度 1市集 / 44.96km ²	
		人口密度 199.23人 / km ²	

資料來源：市集數取自膠縣志（民20年刊），村莊數與全縣面積、全縣人口數取自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民國9年刊）

根據上表，可知其市集密度無論就人口論或服務村莊數論，實小於掖縣、高密。但如將之與昌邑相較，則每市集服務人數少於昌邑，亦即在人口關係上，市集密度大於昌邑。但每市集服務村莊數，則大於昌邑，亦即市集在對村莊關係上密度小於昌邑。昌邑每市集服務一七·四六村，而膠縣則高達二一·四九村。此蓋因昌邑每村平均人數（六二八·〇五人）高於膠縣（四一六·七六人）也。故昌邑較有集村現象，而膠縣則與掖縣、高密、平度情況相仿，每村平均人數較少。

關於膠州縣城本身都市化及現代化之情況，由於鐵路經過縣城北郊，故其商業繁榮及都市化作用強烈地區在城北。現代化設施亦多在此一地區，有馬路通車站，新式學校及教堂多在此區。（註四八）另一在廿世紀初期較為繁盛地區則為塔埠頭，塔埠頭距縣城約十八里，為膠州通海之港口，距青島隔海僅三里，其地與膠州縣城及王台構成一三角形，昔日王台、膠州縣城貨物多由此出海，青島興起後，雖市況不如以前，但因與青島隔海相對，距離又極近，故仍是鐵路線以外貨物出入之主要港口，海邊民船大多集此。據日人記載，其地在民國初年時有入口二、三千人。（註四九）

大體而言，膠州縣城因青島興起，其市況為青島所奪，純為一行政中心及一般土產市場。城內多冶鐵小作坊，商業不繁盛，人口過去或有數萬，（註五〇）而至民國初年，日人記載，僅千戶，約七千人。（註五一）由此可知，青島興起及鐵路之修建，雖對縣境東部市集興起有相當之影響，但對膠州縣城本身而言，則打擊甚大，使其市況轉而衰落，大不如前。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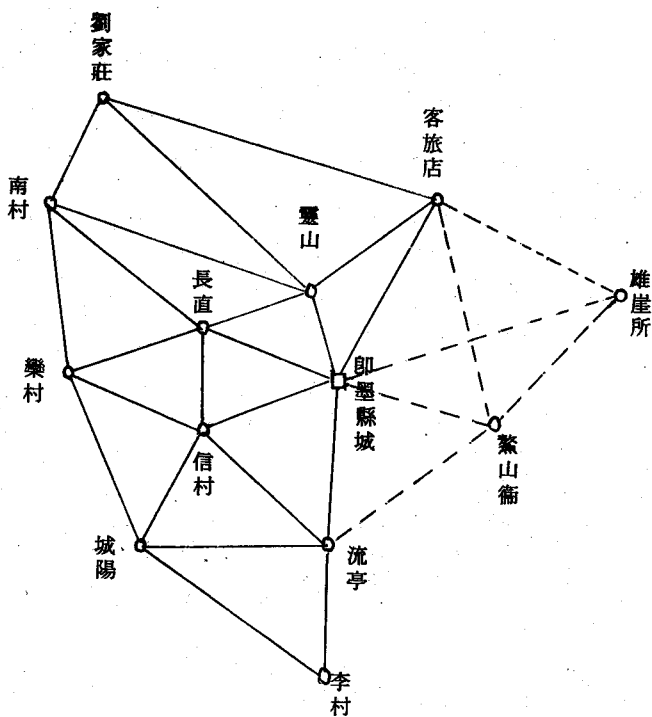
即墨亦為山東省之一古縣，境內東及南部勞山盤踞，地勢高亢，屬於山區，且濱海，青島即在縣之南端。西部及北部則在膠萊地塹東南角，屬平原地帶，與膠州、萊陽、平度相界。縣城確定於明代後期，位於全縣中心稍稍偏西位置，當山地與平原接壤處。故縣城地理位置已使其可成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全縣面積據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計一一、二〇〇方里，即二、八〇〇平方公里。大於膠州、高密、掖縣、濰縣，而小於平度、昌邑。其自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及人口增長率變化如下表：

時 期	人 口 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洪武時期 (1368 ~ 98)	126,800 人	45.29 人	
萬曆 32 年 (1604)	27,365 人	9.77 人	— 7.42 %
乾隆 29 年 (1764)	174,380 人	62.28 人	11.64 %
民國 9 年 (1920)	445,748 人	159.20 人	6.03 %

資料來源：明代人口數取自萬曆 32 年刊萊州府志，乾隆人口數取自乾隆 29 年刊即墨縣志，民國 9 年人口數及面積取自民國 9 年刊山東省各縣鄉土調查錄。

由表中數字可看出，洪武期間人口密度甚大，每平方公里有四五·二九人，其密度之大在膠州與高密、昌邑之間，但萬曆時期，人口反而銳減，僅有二萬七千餘人，佔洪武時期百分之二一·五八。是記載有誤，抑或確實如此？如確實如此，則顯然是受倭寇海盜騷擾及天災之故。蓋膠州根據記載，至萬曆時期亦有人口略減之現象也，而其原因則在於倭寇及海盜騷擾與天災。本地區距膠州甚近，而且幾三面環海，其受倭寇及海盜之侵擾應尤甚於膠州。致使其人口密度在萬曆時期僅每平方公里九·七七人，

根據萬曆刊萊州府志，知當時即墨縣計有城集五，鄉集十三。（註五二）其結構如本頁所附圖。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圖例：—— 明萬曆時市集結構線
 ----- 可能為明代前期市集結構線

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負七·四〇。當然本地區人口數字在萬曆時期如此低落，亦可能由於戶籍之破壞，及人民之逃戶，致而有戶籍之人口數甚低，而實際人口數或應不祇於此。

由萬曆卅二年至乾隆廿九年一百六十年間人口情況略有改善，人口密度升高至每平方公里六二·二八人，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一·六四，較高密度地區情況良好。乾隆十四年時高密度地區人口密度僅四〇·二二人，其由萬曆卅年至乾隆十四年（一六〇二至一七四九）人口年增長率為千分之三·〇六，均低於即墨甚多。

由乾隆廿九年至民國九年之一五六六年間，即墨人口增加快速，至民國九年時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一五九·二〇人，高於昌邑，但低於平度、膠州、掖縣、高密。此時期人口年增長率則為千分之六·〇三，與何炳隸書中所言，此時期全國平均人口年增長率千分之六·三〇相接近。

根據上述即墨縣人口變化情形，可約略得窺，其市鎮發展亦必明萬曆年間情況不及明初，而整個清代必好於明代甚多。清末民初則發展更為迅速。成爲此五百餘年來之最高峯時期。茲根據明萬曆刊萊州府志及清代即墨縣志，比較其市鎮發展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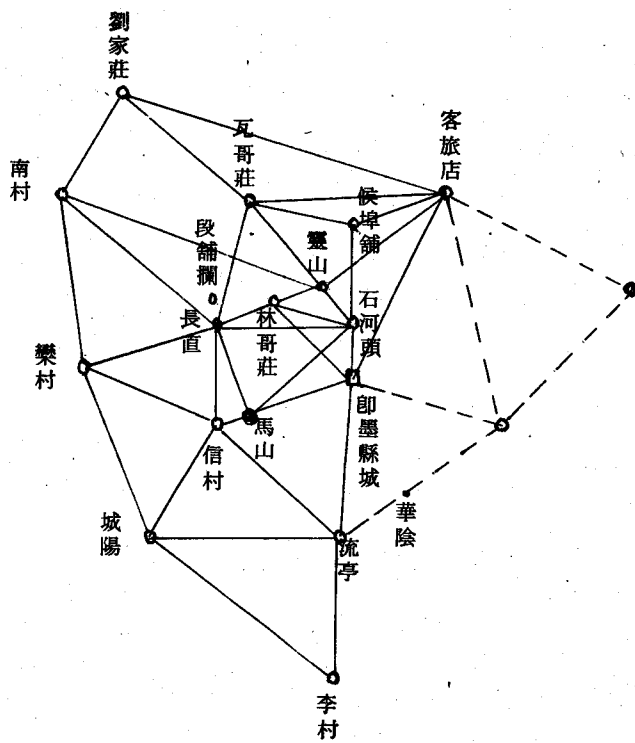
由此結構圖可以清楚看出：一、萬曆時期即墨縣境內各市集幾全在西部，北部及南部平原地帶，而東部及南部山區近海處除李村外，幾無一市集。由此或可證明，當時由於倭寇及海盜侵擾關係，此近海山區經濟似極衰退，乃至於市集不發達。但由鰲山街及雄崖所均在此山區，可知明代前期此一地區，至少此街及所在地，應是有市集的，祇是至萬曆時期業已荒廢罷了。二、萬曆時期即墨全境已形成半個兩層市集圈，其內圈係由流亭、信村、長直、靈山以及客旅店所構成，距縣城約在十至廿里之間。外圈則由劉家莊、南村、欒村、城陽、李村所構成，距縣城約三十至四十里之間。而且就其結構形象觀之，其內圈約略呈完整之半個六角形。由上述的市鎮結構可知即墨縣城在萬曆時期已是全縣之行政及經濟中央市鎮。三、由圖中虛線部份可以看出，極有可能，在明代前期其內圈六角形市鎮結構業已形成，鰲山衛似應為此內圈六角形之據點。而其外圈圖形之所以不夠完整，主要係因東部距海極近，鰲山衛及客旅店均已臨海。如果此一看法可代表其真實性，則可知以縣城為中央市鎮（亦即六角形中心）之六角形形成，往往受縣城之中心位置影響，如縣城不在此一中心位置，則此種六角形之形成必甚困難。由此我們或可作如此的結論：六角形市鎮結構之形成，除受其經濟條件與人口及交通結構影響外，更受地理形勢及縣城或中央市鎮之位置影響，故必須上述諸項條件相配合，否則勢難出現。因此六角形的市鎮結構並非在任何一地區出現，亦絕非常態的一般的市鎮理想結構形態，祇是某一期之理想市鎮結構之一種罷了。G.W. Skinner 將之視為中國市鎮結構最具代表性之理想形態，似嫌以偏概全。四、就即墨地區內圈六角形市鎮結構而言，其此一結構之完成，顯應更早於浙江省金華府。蓋金華府在清代前期始有此六角形結構出現。唯當時金華地區經濟力強於即墨，故其六角形市鎮結構已有多層發展。（註五三）

小。

明萬曆時期即墨地區之市集密度是每二一五·三九平方公里方有一個市集，遠較高密度區一九一·六七平方公里有一市集為小。

清代前期即墨地區市集結構之發展，根據乾隆廿九年刊縣志，可知當時共有城集四，較萬曆時期減少一，鄉集廿三，另有神會四。（註五四）其已知各市集結構圖如次頁所示。

根據此圖可看出，所增市集大多是修補原有之市集圈。更由於瓦哥莊的興起，使內層市集圈由靈山外移至瓦哥莊。而且其已知所增市集大多在此內層市集圈內。由此或者可以了解，清代前期時，即墨縣城經濟力較明季有所增強，唯增強的幅度不大。極



墨地區形成內中外三層市集圈，其外層市集圈除於南端李村以外地區，與東部鰲山衛及雄崖所附近地區向外延伸，其他各處變化殊小。此因是受海及縣界影響。中圈市集帶（即原來之內層市集帶）與清代前期情況大體相同，唯客旅店地位為周疇口取代。而中圈與外圈之間，特別是南村、長直、信村、城陽、藥村之間，有不少市集興起，使其結構趨於繁密，此顯然是受膠濟鐵路興建之影響。其東部地區在明末至清代前期時原少市集，現亦因鰲山衛、雄崖所諸市集之興起，使其市集結構趨向完整。故至廿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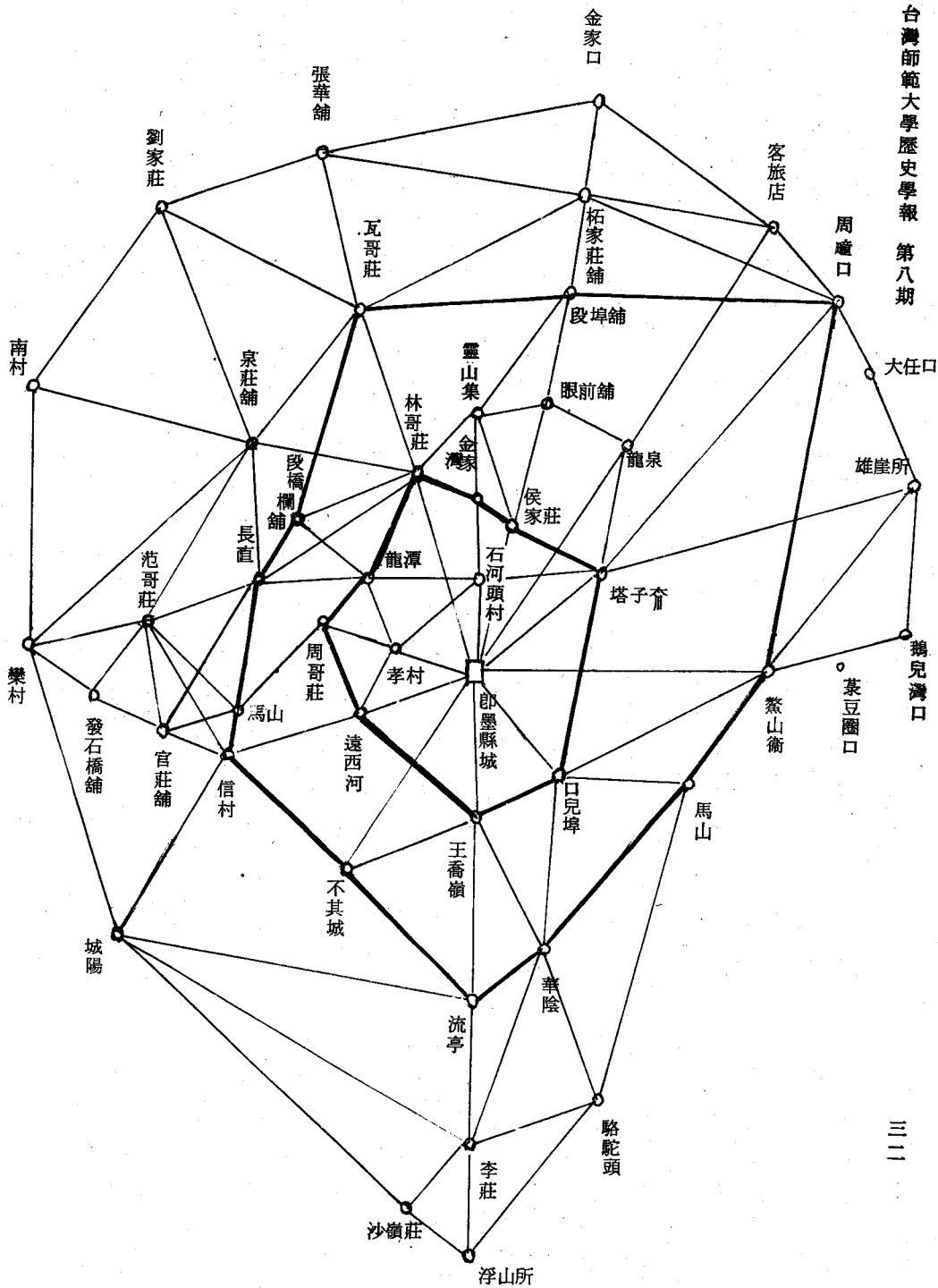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有可能此一經濟力的增強仍是來自於人口的自然增加。此外，清代前期市集仍未出現鰲山衛及雄崖所之名，而且東部及南部市集情況一如明季，幾無興起。此亦可說明，清初此一地區仍未有任何顯著之發展。唯此一看法祇是一種假定，蓋在其市集名單中，有七市集在光緒年間刊即墨地圖中無法尋出，故其真實情況與上述之情況容或尚有相當差距。

清初時期即墨縣包括神會在內之市集密度為每一〇七·六九平方公里方有一市集，每市集服務六、七〇六·九二人。

清代後期即墨地區市集發展情形無縣志可作根據，唯據光緒卅二年刊山東省通志所附地圖，可知約有鄉集四十九，其分佈如次頁圖。

根據此圖可知清末即墨的市集極為繁盛，除原有之內圈與外圈市集帶外，並因塔子疇、侯家莊、金家灣、林哥莊、龍潭、周哥莊、遠西河、王喬嶺、口兒埠諸市集之興起，在內圈之內復形成一市集圈。此市集圈距城約七至十里，亦略呈六角形，於是即



初年，即墨爲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地位較前更爲穩固，其六角形之市集結構則已完成於內中二層市集圈，外層因受臨海及地形影響並未形成，可視爲即墨地區六角形市鎮結構發展之高峯期。

要而言之，廿世紀初期由於青島開埠成爲德租界地之影響，即墨地區市集甚爲繁盛。其東部、南部山地均有不少市集興起，使其市集結構趨於繁密完整。

至於廿世紀初期即墨地區市集、村莊及人口三者之密度關係，由下表可知其情況：

市集數	49	村莊數	1,092	全縣面積	2,800 km ²	全縣人口數	445,748人
每市集服務村莊數	22.29村	平均每村人口	408.19人	村莊密度	1村 / 2.56 km ²		
每市集服務人數	9,096.90人			市集密度	1市集 / 57.14 km ²		
				人口密度	159.20人 / km ²		

資料來源：市集數取自光緒32年（1906）刊山東通志中地圖，村莊數及人口數與面積取自山東省各縣鄉土調查錄。

根據此表可知，在前述萊州府各縣中，即墨市集密度甚小，僅大於昌邑（昌邑爲每七〇·三一平方公里有一市集）。每市集服務人數亦僅低於昌邑（昌邑爲每市集服務人數一〇、九六四·六七人）。其村莊密度則高於掖縣及昌邑（掖縣爲每二·七三平方公里有一村，昌邑爲每四·〇三平方公里有一村）。每村莊平均人口數亦低於掖縣五一五·八〇人與昌邑六二八·〇五人。唯此是就其全縣面積而言，而其實際情形，則因即墨在上述諸縣中，全境最爲多山，故在平原地區無論是市集或村莊密度均應是較表中情況爲高。

至於其縣城本身都市化情形及重要市鎮經濟情況，根據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記載，縣城地區共有人口約六千，其中四千五百人居於城內，一千五百人居於城外。城外居民密集之區是縣城郊外西北地區，亦即通青島、萊陽、煙台大道處。（註五五）可知其西北城郊之興起顯係受青島、煙台通商口岸影響。即墨縣城之內，現代化發展不足，街道狹窄，完全是傳統情況。即墨境內之

重要市鎮根據山東省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計有周疇、上崖（雄崖所）、南村、流亭、金家口、鰲山衛六鎮。（註五六）另城陽因在青島租借地內，故未計入。以上諸鎮顯然可視為縣城與定期市集間之中間市鎮。各市鎮之繁榮情形以周疇、上崖、金家口及城陽為最富。上述四鎮，前三者是本縣向北之出口，後者則為通青島之要鎮。其中金家口尤為重要，蓋萊陽地區貨物亦由此出海外散也，有居民約一千五百人。（註五七）

*

*

*

濰縣用今名設治在萊州府中較晚，隋文帝時始分北海郡置維州，或可作為正式設治之始。在此以前，於西漢時屬平壽，北魏、北齊時屬膠東、北周時屬下密，似均未單獨設治。（註五八）明洪武九年降州為縣，稱濰縣，屬平度州。（註五九）由上行政區之變遷，或可看出本地區在萊州府開發較晚，故隋以前始終未曾設治。其全境北臨海，南界安邱、昌樂，東界昌邑，西界昌邑、壽光。南北長東西短，位於膠萊地塹北部極西境。面積一萬零二百方里，即二、五五〇平方公里。（註六〇）在萊州府中，次於平度、即墨及膠州，大於昌邑、掖縣與高密。其城築於明崇禎十二年，此後於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屢次重修，（註六一）故其今城確定於十九世紀初年。縣城位於南部中心偏西位置，由於北部沿海多為海埔新生地，尙未十分開發，故就地理位置言，仍是有利於成為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其明代以來人口密度及年增長率變化情形如下表：

年	代	人 口 數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人口年增長率
洪武時期 (1368 ~ 98)		157,921 人	61.93 人	
萬曆 32 年 (1604)		181,769 人	71.28 人	0.68 %
康熙 11 年 (1672)		143,120 人	56.13 人	- 3.51 %
乾隆 25 年 (1760)		155,021 人	60.79 人	0.91 %
光緒 32 年 (1906)		497,328 人	195.03 人	8.02 %
民國 13 年 (1924)		601,519 人	235.89 人	10.62 %
民國 21 年 (1932)		647,086 人	253.76 人	9.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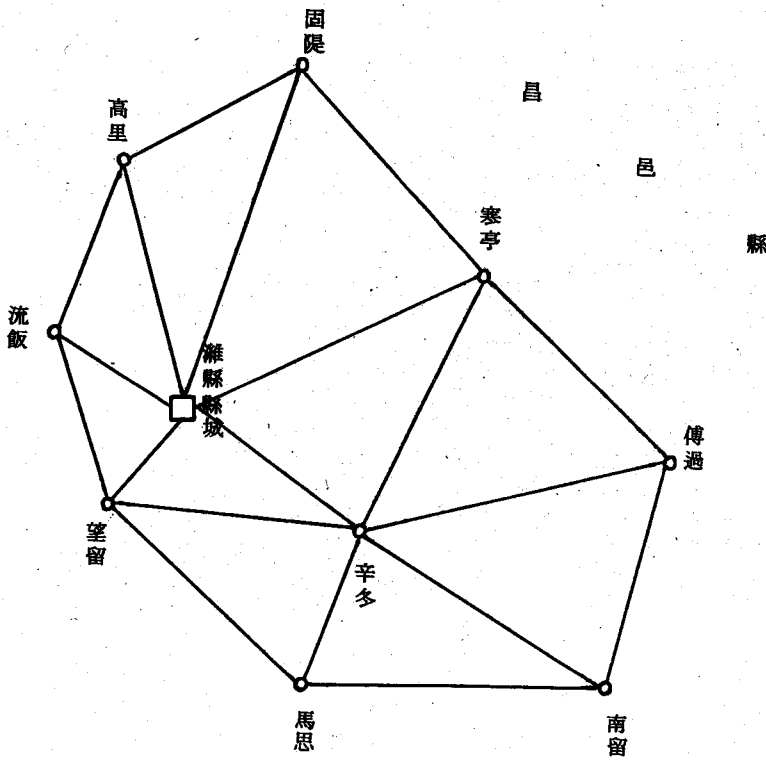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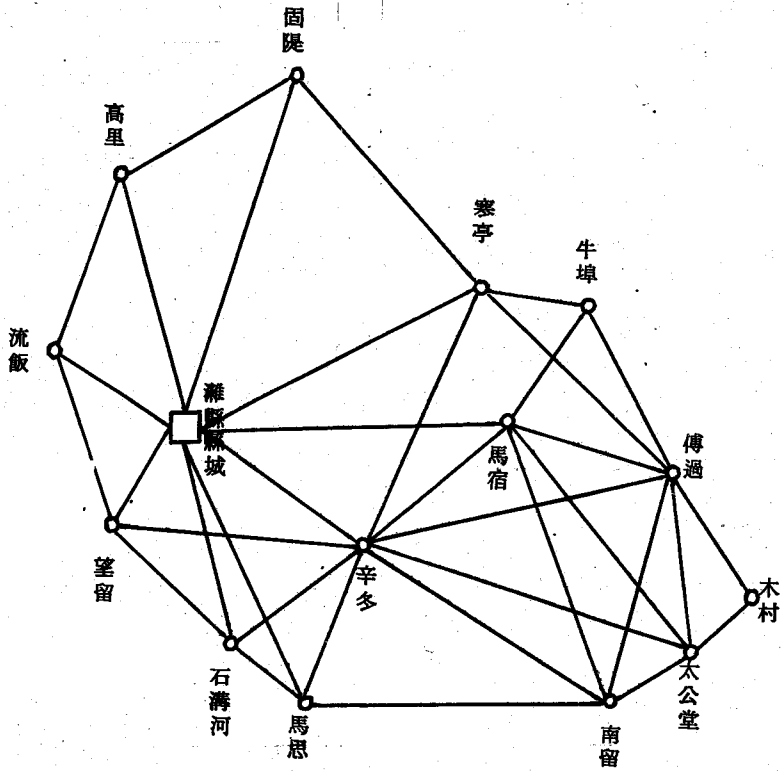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代人口資料取自萬曆 32 年刊萊州府志，清及民國資料取自民國 26 年刊濰縣志。

由表中人口密度可看出，其在洪武時期人口密度已較萊州府其他各縣高出甚多。雖然本地區在歷史上開發較晚，極有可能因地當濟南通山東半島之要道，故人口反而增加較速。其次由明代之人口密度及其年增長率亦可看出，本地區之變遷與膠州、即墨、高密不同，即萬曆時期人口並未較洪武年間減少，反而略有增加。顯然本地區在明代受天災及人為之戰禍侵擾較小。如將之與掖縣情況一併觀之，可看出，在明代本地區雖不如掖縣人口增加快速，但因地近渤海灣，當北京的門戶，是與掖縣相同，甚少受倭寇海盜侵擾的。證之於縣志通紀，亦確實如此。而造成本地區在此二百餘年間人口增加遲緩的主要原因則在於天災。如永樂年間本地區曾有水災、蝗災，宣德年間天旱大饑，人相食。此後此類天災連綿不絕。武宗正德年間本地飽受流民劉七之亂侵擾，城中規掠一空，是此二百餘年間所遭受之最大戰禍。此後仍天災時繼，嘉靖年間復因蝗災大饑人相食。萬曆前期亦復如是。（註六二）在如此情況下，其人口由洪武至萬曆前期年增長率僅百分之〇·六八，實是可以理解之事。而由此亦可推知，此二百餘年間，即墨、膠州、高密地區則較本區情況尤為惡劣，故其人口均呈停滯或萎縮象徵。

由表中數字可看出由萬曆後期至康熙十年之六十八年間，濰縣情況甚壞，故其人口銳減，其年增長率為百分之負三·五，人口密度則減至每平方公里五六·一三人。造成人口銳減之原因，主要在於萬曆四十三年之旱蝗大饑。據縣志記載，時粟價湧貴，民刮木皮和糠秕而食，林木為之盡，饑死者道相枕藉，有割屍肉而食者，故而人口十去其六。（註六三），使濰縣元氣大傷。此後仍天災相繼，故直至乾隆年間其人口增長率始終甚低。乾隆至光緒年間，本地區仍時有天災，唯如萬曆後期者則少見。但同治年間曾受稔亂騷擾，時濰縣係清軍與捻軍相爭之主要戰場。光緒年間時有大水。（註六四）均使其人口增長緩慢。但至廿世紀前期人口密度已高達每平方公里二五三·七六人，顯然承受有強大之人口壓力。

明代濰縣市集情形，根據萬曆刊萊州府志及民國刊縣志記載，萬曆時城內計有市二集十六，四鄉有市集十五。（註六五）其鄉集分佈情形如次頁上圖。

由此圖可看出萬曆時期濰縣地區市集結構已形成兩層二個部分重疊之六角形市鎮結構，其情形與清初之金華河谷地區相同。其以縣城為中心之六角形市鎮結構，係由固隄、高里、流飯、望留、辛冬、寒亭所構成，各市集除固隄、高里距城稍遠外，其餘均在二十至三十里間。其另一六角形市鎮結構，則係以辛冬為中心，由縣城、寒亭、傅過、南留、馬思、望留所構成。此二六角形結構如下頁下圖。



由右下圖形可以看出，辛冬為中心之六角形較縣城之六角形尤為距離對稱。縣城為中心之六角形市鎮結構之所以西南方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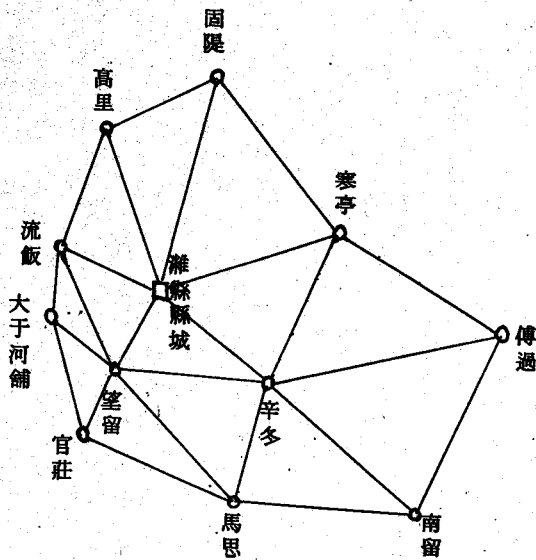
，主要是受該地區與昌樂交界處之山地影響。如將此兩六角形市集結構與昌邑同時期之市集結構合併觀之，則可發現兩縣是屬於同一市鎮結構，即是由數個相連之部份重疊六角形所組成。其情形完全與清初金華河谷地區相同。唯就人口密度言，清初金華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一三八·〇〇人，而本地區此時為七一·二八人，昌邑尤少，僅三一·二〇人，如果上述的人口密度真可代表當時此六角形市鎮結構之人口密度的話，或者可以得到如此結論，六角形市鎮結構的出現雖受人口密度影響，但其所應具有人口密度的幅度甚廣，至少其人口密度可由每平方公里三一·二〇人至一三八·〇〇人。

再就昌邑、濰縣地區地形及交通情況與金華相較，可發現其相同處在：一均為平原地區，二均有流量不算太大之河流，三最普遍之交通方式均為傳統方式之陸路交通。歸納此三項情況或者可得到如此結論，有中等河流之平原地區其交通方式又為傳統的陸路交通，是構成六角形市鎮結構的必要條件，金華地區交通及地形情況與昌邑、濰縣相異處，則在：一金華地區的河谷平原較廣，二河流的流量亦較大。故或者亦可作如此的假定：有中等河流之平原地區其交通方式以傳統陸路交通為主雖是構成六角形市鎮結構的必要條件，但平原較廣，河流較大，仍是對其六角形市鎮結構的蔓延與完整有促進功能。

至於掖縣、平度、高密及膠州為何無此六角形市鎮結構之出現，就已知之情況言，或由於資料不全，如掖縣，或在於地形影響，如平度、高密，或由於中央市鎮之位置不夠適中，而其他中間市鎮又不夠發達，如膠州，致而在膠萊平原地區其六角形的市鎮結構並不能如金華河谷平原地區連成爲一個整體，僅見於昌邑、濰縣及即墨，但其形成則早於金華地區，在十六世紀後期十七世紀初期已相當完整。

此外值得注意者，濰縣在此時期內，固隄以北缺少市集，此蓋因固隄以北爲海埔新生地，是新墾區，時市集尚未興起。濰縣萬曆時期市集密度爲每一七〇平方公里方有一市集，每市集平均服務一二·一一七·九三人，市集密度顯然不大。

至於清代前期濰縣市集結構，根據縣志記載，康熙時期，濰縣計有城集：市二集六，較萬曆前期已大爲減少，鄉集則有十七，較萬曆前期增二。即於縣城西及南方飯流以南增一大于河舖，望留西南增一官莊集。（註六六）故其市集結構未變，不過使其六角形市集結構由部份重疊之兩個六角形，變爲部份重疊之三個六角形，即增加以望留爲中心，由縣城、流飯、大于河舖、官莊、馬思與辛冬所構成之六角形。（見次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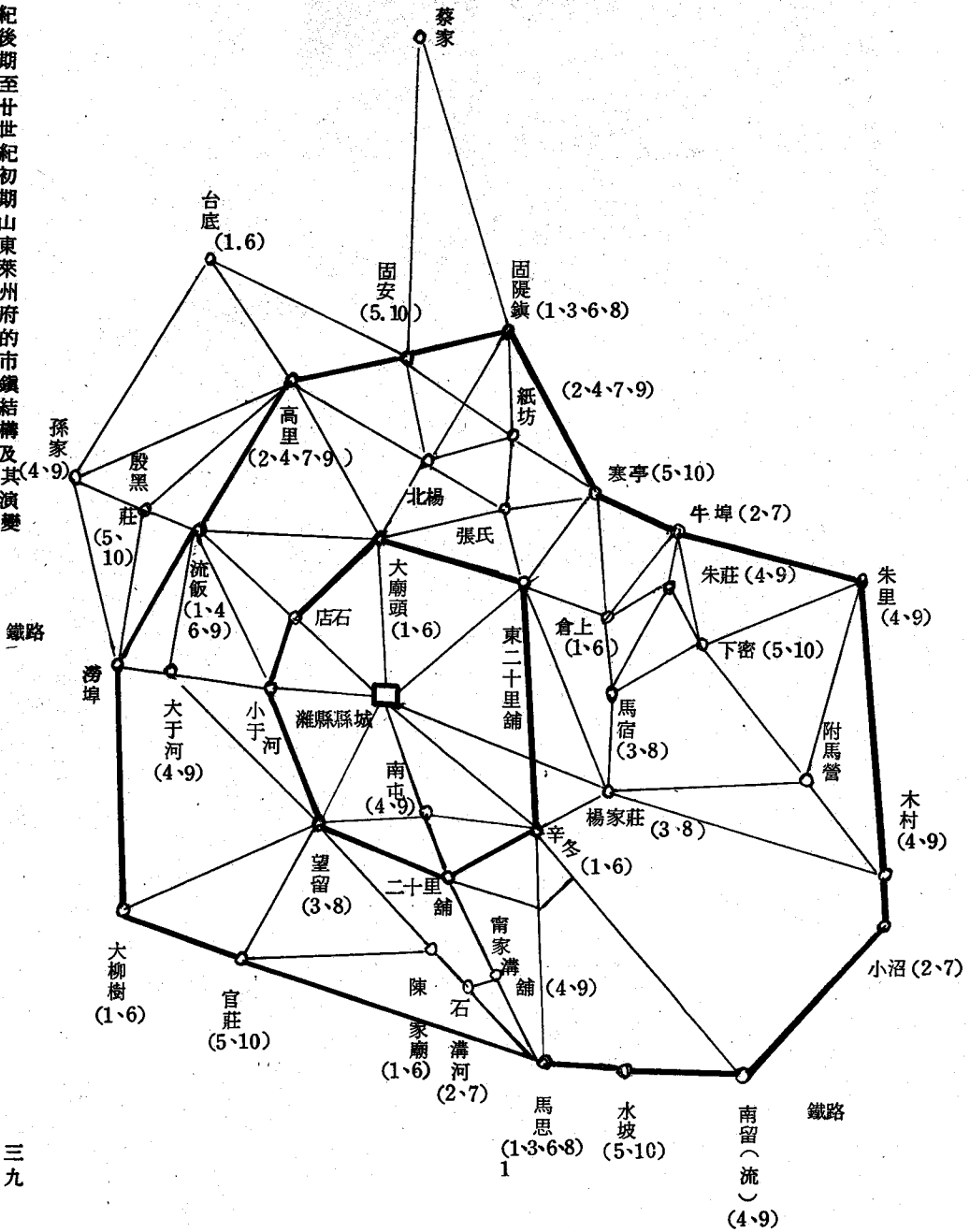


使其六角形市集結構向西南近昌樂界延伸。由於此一地區向西南逐漸有山地，故其六角形仍是西南部較為短小緊湊。此外，由此三個六角形的重疊相依，亦可看出在十七世紀的後期，此三六角形重疊部份即是其人口密集之區。再則由此時期內鄉集增加的微弱與城集的大量減少，或者亦多少可以了解，萬曆後期的大饑荒，對康熙時期市集的發展仍是有相當強烈影響的。

光緒時期據縣志記載，計有城集三，鄉集七十一。其鄉集結構如次頁圖。根據此圖可知：一、市集較明季及清初增加甚多，特別是在縣北及縣南地區。

縣北市集密集區多在寒亭、固隄、高里、流飯一帶，而且流飯、高里、固隄、紙坊諸大鎮均已形成每旬四日有市，顯係中間市鎮，幾將完全脫離定期市集之形態。此在膠萊平原而言，實為所僅見。由此一地區市集的密集與中間市鎮的興起，亦可了解，縣北地區在十九世紀有急劇的發展，甚至原來低窪潮濕之海埔新生地帶，亦漸有市集興起。縣南地區市集的增加顯然是因人口的增加與鐵路之興建。故原來即人口稠密，市集發達之區，現在較前更為市集加多。馬思亦因而形成為旬日間有四日為市。極有可能，將來如南留（流）、木村亦將變成為每旬四日為市的中間市鎮。二、由於境內市集的密集與繁榮，其六角形市集結構業已完全破壞，但三角形為基礎之市集圈仍然存在。如倉上（一、六）、馬宿（三、八）、牛埠（二、七）、下密（五、十）、侏莊（四、九）所組成之市集圈，雖構成一四邊形，但其實質關係仍是由多個三角形所組成。此一情形或可視為一種明證，即六角形市集結構實係市集發展過程中之一種市集結構，當其市集增多，交通改變，則此一結構將遭破壞而有所改變，應非是靜止不動，永遠不變者。三、六角形市集結構雖已破壞，但以縣城為中央市鎮之市集結構未變，此市集結構可分為二層，內層則由二十里舖、辛冬、東二十里舖、大廟頭、店子、小于河、望留所構成，距縣城約二十里。外層則由官莊、大柳樹、滿埠、流飯、高里、固安、固隄、寒亭、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牛埠、朱里、木村、小沼、南留、水坡馬思所構成，距城約四十至六十里。而各中間市鎮多位於外層。外層與內層之間，東北及西北部市集繁密。其西北部在外層之外有再產生一市集圈之趨勢。因此可知在十九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前期，濰縣應是經濟極其繁榮，市集甚為發達之區。四、由濰縣絕大多數市集旬日間兩日為市，可以了解，萊州府地區各市集旬日間兩日為市之產生雖來自於人為的習慣，但當其經濟有突破發展時，一樣可突破此一為的習慣，而達到旬日間有更多的集期。甚至不必經由旬日間三日為市之階段。因此我們可作如此的論斷，即：市集的集期形成主要在於人為的習慣，並非是純受經濟力的驅使，而且其集期的發展亦並非是一定要循序進步的，亦即並非一定要由旬日間一日為市，進至二日、三日為市，然後再進至四日為市，以至於日日為市的。

至於此時期內濰縣市集、村莊與人口的密度關係，由下表可知其梗概：

市 集 數 71	村 莊 數 1,041	全 縣 面 積 2550Km ²	全 縣 人 口 數 601,519人
每市集服務村莊數 14.66村	每村平均人數 577.83人	市集密度 1市集/35.92Km ²	
每市集服務人數 8472.10人		村莊密度 1村/2.45Km ²	
		人口密度 235.89人/Km ²	

資料來源：市集數取自民國二十六年刊濰縣志，人口數取自同書民國十三年數字，面積及村莊數取自山東省各縣鄉土調查錄。

由表中人口密度一項可以看出：濰縣是萊州府七縣中人口最稠密之區。高於人口最稀之昌邑縣達〇·五一倍。即與其他六縣中人口密度最大之平度相較，亦高約〇·〇九八倍。市集密度則低於高密（三五·三九平方公里）。村莊密度則低於高密（二·二三平方公里）、平度（二·二六平方公里）。每市集服務村莊數則大於掖縣（一三·四五村），居第二位。每市集服務人數亦大於掖縣（六九三九·一一人）、高密（六三三九·六人），居第三位。故就市集服務村莊數及人數而言，由於本地區人口密度

最大，故雖市集衆多，但在萊州府並不是最少者。

濰縣城及其重要市鎮之都市化情況，由於縣城地當濟南通青島、煙台之交通樞紐上，並爲山東內地土產中心市場，故人口衆多。據日人支那省別全誌記載，城內外總人口約八萬。（註六七）縣城內居民二、三千戶，人口約二萬五千左右。經營商業者約佔三至四分之一。城內商業不發達，主要係官衙、學校及富紳住宅。（註六八）東關與縣城隔白狼河相峙，係縣城之商業區，居民有七、八千戶，人口約三萬以上。（註六九）東關之繁盛顯然係因水運及鐵道交通所造成。蓋白狼河由南北流入海，有良好的水上交通，東關雖不近鐵路（鐵路經濰縣城外南方數里處），但因中隔外人居留地，又有白狼河及馬路可補其遠離鐵路之缺點，故仍是貨物主要集散處，可視爲濰縣的外港與商埠。城南之外人居留地因設置較晚，故於民初時仍未繁盛，但將來勢必爲濰縣都市化最急劇之區。

濰縣新式工業計有織布廠二家，烟廠一家，草編廠一家。其對外輸出仍以土產爲主：如蠶絲、食糧、蔬菜、鐵器及刺繡等，其中僅刺繡一項，年輸出金額約在二百萬兩。（註七〇）綜括而言，濰縣縣城之現代化、工業化情況仍處於萌芽階段，約與高密相仿，但在山東一般縣份中，已屬超前甚多。

至於其他大鎮，據山東省各縣鄉土調查錄記載，則以寒亭最爲殷實，其他諸鎮平平。唯就將來發展言，固隄鎮勢必興起，爲北部新墾區之中心；南留則因爲鐵路所經，亦有成爲東南區之一大中心可能。

※ ※ ※

綜觀整個萊州府在明、清兩代間情形，我們可得到如此的結論：由於山東地區在我國歷史上開發較早，故本地區除掖縣外，大多於明初（十四世紀）即甚發達。其人口密度如濰縣竟高達每平方公里六一·九三人，其他各縣除掖縣外，亦均在每平方公里四〇人以上。可知萊州府除北部沿海地區外，均已人煙較爲稠密，故市鎮之結構亦略具規模，甚至如即墨地區並可能有六角形之市鎮結構出現。但發展至萬曆期間（十六世紀後期及十七世紀初期），本地區除臨渤海灣三縣掖縣、平度、濰縣外，大多衰落，人口銳減，甚至如即墨地區人口密度降至僅有每平方公里九·七七人。顯然其膠萊平原南部諸縣在此三百年間，遭受天災人禍的襲擊遠比北部三縣爲嚴重。而在所遭受的天災人禍之中，主要使其人口銳減的原因仍在於倭寇及海盜的侵襲以及海禁政策的實

施，故其市集與人口密集之區在內陸而不在沿海。

清代初期由於人口資料缺乏，不知其詳細情況。唯根據已有的高密及濰縣資料，可知於康熙時期仍是在人口減少之情況中，而造成人口減少的原因顯然仍是在於天災與沿海地區的不靖。直至乾隆以後（十八世紀）方有較速之發展。要而言之，由十四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期，萊州府的市集發展速度不高，其重心在於內陸。但由於處於平原地帶，再加以明代初期即已甚為開發，故於若干縣城為經濟中央市鎮地區如濰縣、昌邑及即墨，在此時期內已出現有六角形的市鎮結構。

清末民初時期，萊州府整個地區人口及市集密度均有突飛猛進之發展。就人口言，人口年增長率極高，人口密度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時均超過每平方公里一五四人，甚至如濰縣在民國十三年時高達二三五·八九人。此與個人上年度人口研究：山東省於太平天國之亂以後有強大之人口壓力極為相符。其市鎮發展，不僅是密度增大，中間市鎮興起，沿海地區市集開始發達，而且市鎮結構趨繁，大多形成以縣城為中心兩層以上之市集圈。並且若干地區如濰縣其已形成之六角形市鎮結構則因此遭受破壞。造成十九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本地區的市集快速發展之主要原因，仍在於中外通商，海運發達，煙台與青島的開埠，以及膠濟鐵路的興建。故當交通樞紐地位諸縣，如濰縣、高密、膠州均情況與前大不相同，接近鐵路地區市集分佈密集，濰縣六角形市鎮結構之破壞，極有可能部份亦受有此一交通結構改變之影響。在其他縣份，由於地近青島與煙台，土產輸出較便，人民生活略有改善，人口增加迅速，故其市集的增多亦甚快速。

萊州府的市集形態無論是在明代以至於清末民初，絕大多數市鎮仍保有旬日間兩日為市的集期。顯然本地區的旬日間二日為市集期之形成，在於人為的習慣與交通的不便。就另一方面言，此一句日間兩日為市的集期形態對本地區市集的發展與中間市鎮的興起，却頗有影響。蓋旬日間兩日為市，表示市集的集期甚為稀疏，在本地區經濟力增強時，如要保持此一習慣，則勢必多設市集，方能足數其需要。故本地區小市集在清末民初時期有大量的增加。而小市集的增多固可滿足居民經濟上的需要，但却造成其市集本身經濟力的分散，於是亦對中間市鎮的興起形成莫大的阻礙。本地區中間市鎮的稀少，極有可能，亦部份種因於此。當然，無論如何，市集集期的稀疏與中間市鎮的稀少是代表其經濟力的不足與交通的不便。故本地區在整個此五百餘年間，在經濟與交通上，應是屬於一典型的傳統形態，即經濟與交通均嫌不夠發達。但由清末民初時期濰縣少數市鎮有旬日間四日為市之現象，

亦可看出，至少廿世紀初期，若干地區經濟力的增加與交通情況的改變，已漸具有突破此傳統局限的能力。

萊州府的市集形態雖是旬日間兩日爲市，但其基本市集結構仍是三角形，並非是四或五市集構成一多角形市集圈。此一情況亦明白顯示出，本地區經濟的不夠繁盛與交通的不便。蓋市集既旬日間兩日爲市，三市集所構成的三角形市集圈在一般情況下勢必使貿易者旬日間有四日休息。如經濟力強大，應無此一現象。而日後經濟力增強時，所採取的補救辦法，則是市集增多，使新增的市集與舊市集間構成另一個三角形，例如濰縣在馬宿附近，其市集貿易圈原是由馬宿（集期三、八）、倉上（集期一、六）與偉莊（集期四、九）三市集構成，即貿易者於初二、初五、初七、初十，四日休息。後因人口增多，經濟力加強，乃有下密（集期五、十）、牛埠（集期二、七）興起，於是五市集相集之四邊形，其貿易者可每日輾轉貿易。如果萊州府此種市集的發展可視爲一種範例，則可知在我國傳統的市集結構上實係以三角形爲其最基本的基礎，日後經濟力增強所造成市集發展的形態，可能有二，一在於市集數目的增多，此種情形尤見於市集集期旬日間二日爲市者。一在於市集本身集期的增多，此種市集發展較多見於旬日間三日爲市者。屬於此一形態，在市集發展上必較有利於中間市鎮的興起。

就經濟中央市鎮的情況而言，萊州府表現兩種情況：一是縣城本身即是全縣的經濟中央市鎮，如濰縣、即墨、掖縣、平度、昌邑，此類情形大多是縣城在地理上居於全縣的中央或近乎中央位置。一是縣城並非是全縣的經濟中央市鎮，僅是所在地區的小區域經濟中心，如膠州、高密，此類情形大多是縣城位置較偏。蓋在傳統時代交通比較不便，經濟力亦有其幅度不大的極限。縣城如地理位置適中，則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可改變其交通結構，增強其所具有的經濟力量，故得成爲全縣的經濟中央市鎮。如果位置過偏，其行政中心地位所能產生的改變交通結構與增強經濟力量有限，故無法使其發展成全縣唯一的經濟中央市鎮。故縣城地位的適當與否，是決定其是否能發展成全縣經濟中央市鎮的一項極爲重要的先決條件。

在萊州府地區亦有縣城原非爲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唯日後則逐漸發展成全縣之經濟中央市鎮者，如在廿世紀初期之高密。造成此種情形的根本原因，仍在於交通結構的改善與縣城本身經濟力的增強，以及全境市集的廣泛興起。高密此種情形的形成顯然受十九世紀末對外貿易繁盛影響，以及鐵路的興修，使其在縣城以北、以南近鐵路經過地區有甚多小市集的興起，乃增強縣城經濟影響力，而改變其原有市鎮結構。

至於在十九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萊州府各縣城及其重要市鎮都市化、現代化情形。大體而言，縣城有顯着都市化現象者，則為濰縣。濰縣由於地居濟南通青島、煙台的樞紐地位，而且又幾是山東省內陸的中心市場，故於近代對外貿易興起，煙台、青島開港後，人口逐漸增加，都市化現象顯著，於廿世紀初期人口已有七、八萬，於是其縣升級為一等縣。其都市化最為顯著之市區，則為東關，無論人口密度與經濟力均已超過縣城城內甚多。此一都市化情況，可視為我國傳統都市在近代發生都市化作用時之典型模式，即其都市化作用並非是由傳統城市內生長，向四郊延伸，而是在市郊近交通樞紐地位處另成新市區，向城市本身及附近地區發展，使之與城市本身聯為一體，並因此帶動其老市區或城廂內地區的都市化與現代化。就萊州府而言，此種都市化情況亦見於其他各縣，如鐵路所經之高密、膠州無不如此，祇是其都市化作用無濰縣顯著罷了。

萊州府各縣城在近代因交通結構改變而趨衰落者，則為膠州。膠州因近海，距青島近，原為膠萊平原南部地區貨物集散及對外輸出重要城市。但因青島興起，其貿易遂為青島所奪，城北雖有鐵路經過，但因距青島太近，貨物遂不再在膠州集散，均由各地經鐵路或大道直接運往青島。故其城北地區雖因有鐵路所經，有少些都市化現象，而縣城本身則日趨衰落，市況大不如前，人口遂由數萬而降至僅七千人。

綜括上述之討論，我們可以了解，萊州府各縣的市集發展在明代初期即已建立相當的基礎，而且當時南部各縣尤好於北部各縣。此後的發展南北兩部呈現不同的情況，北部因地臨渤海灣，當北京的門戶，治安較為良好，故得繼續發展，而南部則因倭寇侵擾與天災頻仍，有衰退或發展遲滯之現象，此一現象尤以沿海地區為甚。故至十六世紀後期十七世紀初年，南北兩部市集發展的差距逐漸拉平。甚至在市鎮結構上，濰縣、昌邑及即墨均有六角形市鎮結構出現。清初由於資料缺乏，難知其詳情，但根據少數縣份已有之資料，仍可看出，市集的發展甚為遲緩，唯乾隆（十八世紀）以後，由於人口的急增與對外貿易的漸興，市集發展開始趨向急劇。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因煙台及青島兩港的興起，以及鐵路的興建，使其市集發展乃達於高峯。但一般而言，都市化現象除濰縣外並不急劇，仍處於傳統情況之中，現代化設施僅在少數地區萌芽生長。其都市化作用所造成的市集結構重大改變，則在濰縣境內的六角形市鎮結構遭受破壞，使其市鎮發展已漸突破傳統的局限。

附註

- 註一 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民國四年重印，卷十八，疆域志第三，台灣華文重印本，第二冊，頁一〇〇二。
- 註二 同上書，華文重印本，第二冊，頁一〇二〇。
- 註三 同上書，華文重印本，第二冊，頁一〇三二。
- 註四 關於溫州府金華府府縣城間結構可參閱拙著「溫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教學與研究，第一期，頁一三八—一四〇；及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七期，頁一一三—一八八。
- 註五 山東通志，華文重印本，第二冊，頁一〇五四。
- 註六 林修竹編，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民國九年刊，卷九，頁六一。
- 註七 重刊萬曆萊州府志，卷五，市集，頁二五至二六。
- 註八 乾隆五年刊萊州府志，卷三，市集，頁一一。
- 註九 如將此時掖縣人口密度與十九世紀末金華府相較，則僅次於東陽（一九二人）及義烏（二二一人），高於金華（一五三人），蘭谿（一二三人），湯溪（一八二人），永康（一五六人），武義（一〇〇人），浦江（七九人）諸縣。
- 註一〇 市鎮共有六四，係據續掖縣志，即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資料，與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刊，年代相差十五年，再則掖縣志中記載宣統年間人口數作七五萬餘，其村莊數作九百餘，均嫌過高，故此處在人口數及村莊數上採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之說。市集數因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中缺乏，故祇有採用續掖縣志之資料。
- 註一一 山東通志，華文本，第二冊，頁一〇五四—一〇五五。
- 註一二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六八。
- 註一三 同上書，卷四，頁六六。
- 註一四 同上書，卷四，頁七二。
- 註一五 萬曆刊萊州府志，卷五，頁二五—二六。
- 註一六 山東通志，華文本，卷三九，頁一四九六。
- 註一七 道光廿九年刊平度州志，卷廿三，考一，形勝。
- 註一八 康熙五年刊平度州志，卷之一，頁一九—廿四。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 註一九 道光廿九年刊平度州志，卷九，頁一〇四。
- 註二〇 丁世平等修，續平度縣志，民國廿五年刊，成文本，第一冊，頁七六〇一七五。
- 註二一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六八。
- 註二二 續平度縣志，成文本，第一冊，頁七五及頁一七八。
- 註二三 山東通志，華文本，第二冊，頁八二九〇八三九。
- 註二四 萬曆卅二年刊萊州府志，卷五，頁二五〇二六。
- 註二五 乾隆七年刊昌邑縣志，卷三，市集，頁六三。
- 註二六 根據其附文中記載，共有鄉四，市集廿五，汎一，舖六，驛一，鹽場一。（見山東通志，華文本，頁七一八〇七一九）其市集與舖，驛共僅卅二，似過少，故採地圖所載。
- 註二八 同上註。
- 註二九 余友林等修，王熙青纂，高密縣志，民國廿四年刊，成文本，第一冊，頁一一一至一一二。
- 註三〇 同上書，頁一二二。
- 註三一 同上書，頁一六一。
- 註三二 同上書，頁七八。
- 註三三 同上書，頁七九。
- 註三四 同上書，頁七九〇八一。
- 註三五 同上書，頁一〇二。
- 註三六 萬曆刊萊州府志，卷三，風俗，頁五二〇五三。
- 註三七 同上註。
- 註三八 民國廿四年刊高密縣志，頁一七七〇一八〇。
- 註三九 同上書，頁三七四〇三七五。
- 註四〇 同上註。
- 註四一 同上書，頁三八一〇三八三。
- 註四二 趙文運，匡超等修，膠志，民國廿四年刊，成文本，第一冊，頁二〇七〇二〇九。
- 註四三 同上書，頁三〇七〇三〇九。

- 註四四 同上書，頁一六二～一六五。
- 註四五 萬曆刊萊州府志，頁二五至二六。
- 註四六 乾隆五年刊萊州府志，卷二，頁一～三。
- 註四七 民國廿六年刊膠志，卷八，頁四九～五〇。
- 註四八 參見民國廿六年刊膠志所附縣城圖。
- 註四九 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三七九。
- 註五〇 據支那省別全誌稱，有五或六萬人。
- 註五一 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三七七。
- 註五二 萬曆刊萊州府誌，卷五市集。
- 註五三 參閱拙著：「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七期，頁一一五至一二六，一七五～一七六。
- 註五四 乾隆廿九年刊即墨縣志，卷二，建置（市廛）。
- 註五五 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三八四～三八五。
- 註五六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一〇一。
- 註五七 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三八六～三八七。
- 註五八 劉東侯、陳鶴傳等修，濰縣志，民國廿六年刊，學生書局重印本，頁一九七～二一四。
- 註五九 同上書，頁二一五。
- 註六〇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頁七四。
- 註六一 民國廿六年刊濰縣志，學生書局重印本，頁三五～三五二。
- 註六二 同上書，頁七四～八二。
- 註六三 同上書，頁八三。
- 註六四 同上書，頁九五～一三四。
- 註六五 萬曆刊萊州府志，卷五，市集，頁二五～二六，及民國刊濰縣志，頁二九三。
- 註六六 民國廿六年刊濰縣志，頁二九三～二九四。
- 註六七 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九八。
- 註六八 同上書，頁九四。

十六世紀後期至廿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

註六九 同上書，頁九四～九五，九八。

註七〇 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卷四，濰縣，頁七七至八〇，及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頁九八～九九，一〇一。